

明代唐宋派选本中的韩愈文章论析
A STUDY ON HAN YU ARTICLES IN TANG
AND SONG SCHOOL ANTHOLOGY IN MING
DYNASTY

萧婷忆
SIEW TING YI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RCH 2023

明代唐宋派选本中的韩愈文章论析

**A STUDY ON HAN YU ARTICLES IN TANG AND SONG SCHOOL
ANTHOLOGY IN MING DYNASTY**

By

萧婷忆

SIEW TING YI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MARCH 2023

摘要

明代唐宋派选本中的韩愈文章论析

萧婷忆

明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流派众多，而唐宋派是明代文学发展中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之一。他们的文论主要都是在对前代文学家及文论家的理论继承而来，甚至把唐代的韩愈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本论文主要是以归有光的《文章指南》、唐顺之的《文编》和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三人的选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运用选本批评的方式来分析三人所编选的古文选本中所选录的韩愈散文，以及他们对韩愈笔法的评析，勾勒出他们的文学主张，还有分析他们对韩愈散文不同程度的接受。

从他们三人选本中不难发现归有光、唐顺之和茅坤虽为文风格各不相同，但不同的风格之中又有共同之处。他们皆认为“法”是写文章的自然法则，诸人皆主张学习前人的行文精神脉理，反对拘守模拟古人词句。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基本上即是归有光、唐顺之及茅坤这一“唐宋派”论文的观点，亦是他们选文的主要准则。他们“师法唐宋”的主张也并非单纯地褒扬或针砭任何一个作者，而是针对各家各体的特色，提出师法各自擅长的文体，更指出各家各文体的优点与不足。

关键词：韩愈、唐顺之、归有光、茅坤、选本评点

ABSTRACT

A STUDY ON HAN YU ARTICLES IN TANG AND SONG SCHOOL ANTHOLOGY IN MING DYNASTY

SIEW TING YI

There were many literary schools in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during Ming Dynasty, and the Tang-Song Literary School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Their literary theories are mainly inherited from the theories of previous writers and literary theorists, and even took Han Yu as the main learning object.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literary viewpoints of Gui You Guang, Tang Shun Zhi, Mao Kun from the Tang-Song literary schools on Han Yu.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anthologies compiled by them using the anthology criticism method, analyzes Han Yu's prose in *Wen Zhang Zhi Nan*, *Wen Bian* and *Tang Song Ba Da Jia Wen Chao*, as well as their literary comments on Han Yu's prose.

We can notice that Gui You Guang, Tang Shun Zhi, and Mao Kun's writing styles are different, bu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mong them. They all believe that "law (fa)" is the natural law of writing, and all of them advocate learning from the spirit of the predecessors' writing and oppose sticking to imitate the words and sentences of the ancients. These is their viewpoint and is also the main criterion for their text selection. Their idea of "learning from the Tang and Song writers" is to propose the styles that the writer while point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writer.

*Keywords: Han Yu, Tang Shun Zhi, Gui You Guang, Mao Kun, Anthology
Commentary*

致谢词

本硕士学位论文是在我的导师余曆雄博士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的。从最初课题的选择一直到论文定稿的最终完成，余老师都始终给予我指导，收获良多。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男朋友，正是由于他的帮助和支持，我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煎熬时刻终挺过来直至本论文的顺利完成。

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最终顺利完成，承蒙师长、同事以及朋友给予的无声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还要感谢培养我长大含辛茹苦的先父和母亲。如今顺利完稿，愿其不再惊扰多方。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明代唐宋派选本中的韩愈文章论析为萧婷忆，作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学位之论文要件。

此证



(余曆雄)

日期：2023年3月1日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曾维龙)

日期：2023年3月1日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萧婷忆**（学号：15ULM05514）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余曆雄博士与曾维龙博士的指导下，经已完成此一题明代唐宋派选本中的韩愈文章论析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人员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拉曼大学



（萧婷忆）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之前或同一时间提交至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萧婷忆 Siew Ting Yi

日期：01/03/2023

目录

摘要.....	ii
ABSTRACT.....	iii
致谢词.....	iv
论文核实书.....	v
论文声明.....	vii
目录.....	v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1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9
第三节：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15
第二章：明代唐宋派古文选本述略.....	19
第一节：归有光与《文章指南》.....	19
第二节：唐顺之与《文编》.....	28
第三节：茅坤与《唐宋八大家文钞》.....	33
小结.....	40
第三章：归有光《文章指南》之录韩文考辨.....	42
第一节 《文章指南》所录韩文辨析.....	42
第二节 归氏之评韩文笔法.....	49

第三节 归有光的为文之法.....	59
小结.....	66
第四章：唐顺之《文编》之录韩文考辨.....	68
第一节 《文编》之录韩文辨析.....	68
第二节 唐顺之之评韩文笔法.....	73
第三节 唐顺之的文学观：“本色”、“文法”	79
小结.....	86
第五章：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录韩文考辨.....	88
第一节、《唐宋八大家文钞》所录韩文论析.....	88
第二节、茅坤之论昌黎本色.....	92
第三节、茅坤之文学观点.....	98
小结.....	106
结语.....	108
引用文献.....	114

表目录

表 1: 《文章指南》作者与选文数量一览表.....	22
表 2: 《文章指南》作家选文篇数.....	23
表 3: 《文章指南》集数及体则分类.....	25
表 4: 《文章指南》六十六条体则及其分类.....	26
表 5: 《文章指南》所录韩愈文章篇目分类.....	42
表 6: 《文编》所录韩愈文章篇目分类.....	69
表 7: 《唐宋八大家文钞》所录韩愈文章篇目.....	89
表 8: 茅坤以“奇”为评语.....	94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明代从明太祖朱元璋建国直到明朝灭亡前后共计二百七十七年，学者依据明代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中期及晚期。初期，从洪武年至成化年（1368-1487）；中期，指弘治年至隆庆年（1488-1572）；晚期，指万历年至崇祯年（1573-1644）。¹不论哪个时期，明代各类文学发展都比较全面，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

以文学创作而言，明代中期是一个“复古”的时期，不断地发掘前代的诗文成就是当时文坛的首要之务，因而编选古代诗文也是一时之风尚。明代“复古”口号之所以会响起，是为了要纠正当时文坛上绮靡之风气。

明代初期台阁体文学盛行，内容上多为称颂盛世帝德，风格上多为平正典雅。²由于台阁体文章过于粉饰太平而缺乏真情实感，使得当时的文坛风气变得浮靡萎弱。为了要纠正台阁体的弊端，明代初期即有林鸿与高棅二人、明代中期有前七子个别都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主张诗歌要恢复盛唐诗风，这无形中促成了当时无数唐代选本的诞生，便是冀望以此诗歌复古的方式与当时盛行的台阁体互相抗衡。

¹ 此分类法可见李修生，《中国文学史纲·明清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另，罗宗强在其著作《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引言中对明代时期的划分也与此类同，见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

² 台阁体主要是指向由明代初期一群内阁大臣们所创立并倡导的一种文体，以杨士奇为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关台阁体文体的详细介绍，可参见廖可斌，《论台阁体》，《压抑与躁动：明代文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20），页147。

同样的，各种古文选本也在一次次不同文论的论辩中相继问世。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提倡用秦汉散文来表达人们的真情实感，以秦汉散文为宗，注重对文章法度的摹拟，但却又过分着重模拟字句。

紧接着在明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崛起，并将前七子作为反拨对象。然而“唐宋派”这一称号起于何时，是一值得探讨之问题。在明清之际已有不少学人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相提并举，诚如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下》中就认为：“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后，东里（杨士奇）、春雨（解缙）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景泰、天顺稍衰，成、弘之际，西涯（李东阳）雄长于北，匏庵（吴宽）、震泽（王鏊）发明于南，从之者多有师承。正德间余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炼，掩绝前作。至嘉靖而昆山、毘陵、晋江者起（按：此处昆山指归有光，毘陵指唐顺之，晋江指王慎中），讲究不遗余力，大洲、浚谷相与犄角，号为极盛。”³再如董正位在《归震川先生全集序》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论述：“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归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论者又必以震川为最。”⁴此外，清代纪昀在论及唐顺之的《文编》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由是可见，在明清学者的观点中，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因相似的文学观点而被归类于同一派别之中。

³ [明]黄宗羲，吴光 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九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页 17。

⁴ [明]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 3。

至于来到近代对明代文学研究论著中，近人郭绍虞在其书中第一节“唐宋派之论文”中也有详细介绍了唐宋派诸子，并以唐宋派等人与前后七子的文论不同作标榜，也点出前后七子的“秦汉派”与唐宋派论文根本之不同。⁵但是郭绍虞在他的论著中却未有明确地提出“唐宋派”这一名称和概念的缘起。后来宋克夫和余莹合撰的一篇期刊论文——〈唐宋派考论〉一文中便指出“唐宋派”这一名称起于夏崇璞。⁶此论文不仅梳理了“唐宋派”概念的提出和定型的问题，也指出此派的形成与时间。黄毅在他的论著《明代唐宋派研究》一书的第一章中也明确梳理出唐宋派称呼的由来。⁷稍后的沈思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第一章也详细地梳理了唐宋派形成的社会背景因素以及其发展的轨迹。⁸从以上的研究论著可见，“唐宋派”这一词的出现是在近代才有，至少在明清之际，诸人并不以“唐宋派”这一称谓来命名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

归有光最初便不喜爱前七子所提倡的复古摹拟之风，然而其他唐宋派成员早期也曾有过一段追随前七子文章法度的创作经历。王慎中和唐顺之早期为“嘉靖八才子”的成员之一，对前七子的文章推崇备至。至于茅坤本人最初也是极为欣赏司马迁的散文，并会逐字逐句地去模仿，诚如他在〈与蔡太白太守论文书〉中说自己“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

⁵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1999），页 206-214。

⁶ 宋克夫，余莹，〈唐宋派考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三期）页 329-333。

⁷ 黄毅，《明代唐宋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 3-8。黄毅此书也补充论述了唐宋派具体代表人物。由于从明清以来，对唐宋派成员并无一个既定的说法，他也对部分学界看法认为不把茅坤看作唐宋派成员之一，提出个人观点。可见此书第一章第三节，页 18-31。

⁸ 沈思，〈唐宋派对韩愈文论的继承与发展〉，中国湖北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14，页 6-19。

长（司马迁），字而亿之，句而拟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恻悲凄也”。⁹但渐渐地，他们也开始对一味摹拟前人的字句产生怀疑，并逐步在思考与论辩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观点。

前七子认为秦汉之后再无文章，提倡对秦汉散文极尽模拟，只注重对文章字句的模仿，却忽略了文章的内涵。唐宋派则提倡唐宋散文，从唐宋散文的秉承中上溯六经体系，无形中是继承了整个散文的发展脉络。归有光、唐顺之及茅坤等人正是受了此复古风气的影响，纷纷编选前朝文选，以阐明自身的文道观。而韩愈作为唐代散文大家，继承先秦与汉代散文书写传统，为散文创作带来新变，率领着唐宋两代散文的发展。因此，韩愈也成了唐宋派诸人标榜之对象之一，并将其文章选录其中。作为唐宋派的一员，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诸人所编选的散文选本难免带有某些特殊意味与目的。

再加上，明代是历来文学论争和文学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些作家或文论家，除了在他们各自的文集和书信中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以外，同时亦通过编选前朝的文学作品，并且加上评点或序跋来宣扬自己的文学观点。评点之学来到明代大兴，明清之时的通俗小说、戏曲与诗文的评点著作卷首时常载有“读法”等例言，这种传统源自于宋代儒学。¹⁰宋代的儒家读书非常讲究读书之法，譬如：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就有《读〈论语〉〈孟子〉法》。¹¹宋代以后的诗文评点本，特别是古文评点本，

⁹ [明] 茅坤，《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页 196。

¹⁰ 章培恒，《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页 223。

¹¹ [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 44-45。

诸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卷首也列有《总论看文字法》一篇来阐述自己的评点标准。¹²此类评点著作，读法虽然千变，但百变不离其宗。“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最早定型于南宋，繁盛于明清两际。

更何况评点的兴盛也与科举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评点之书多为科举服务，由于韩愈古文契合科举士子初学古文的需求，故此韩愈文章则成了众多古文评点家所热衷评点的对象。这种融合选本与评点的两种文学批评方式其实并非明代首创，早在南宋以前即已有之。学者张智华就曾指出：“选本与评论结合，在南宋以前已零星出现，如：梁萧统《文选序》、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论等。但总的来说，南宋以前时文选本大多数仅选作品，而无评论。南宋的时文选本不仅有序论，而且有圈点、评点……形成一种新的选本形式，且在后代成为传统。”¹³无独有偶，唐宋派诸子所编选的古文选本也皆重在指出为文的途径，习文之法度。这是因为归有光、唐顺之及茅坤等人皆认为唐宋文“有法可窥”，故此深以为学文当从唐宋文下手，并以此为标准而大量选录唐宋人的文章，编录成集，以教学子一窥为文之途径。有关归有光、唐顺之和茅坤等人所以为的“法”，本论文将于下篇分论之。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西）人，三岁而孤，随伯兄贬官岭表，擢进士第，会董晋位宣武节度使，任职观察推官，后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国子博士等，晚年任吏部侍郎，故人称“韩

¹² [宋] 吕祖谦评，[清] 徐树屏考异，《古文关键》（台湾：广文书局，1970），页 18-20。

¹³ 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 8。

吏部”，《旧唐书》与《新唐书》皆载其传。¹⁴韩愈不仅是中国儒学系统中的至关重要的人物，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关于韩愈的研究，目前学界已取得累累硕果。

本论文则以明代的韩愈选本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本文选择这一论题，主要有以下几点牵引：其一，为韩愈的研究进一步补充文献资料，本论文将从选本批评角度出发，就几部明代的韩文选本，从而为韩愈的研究，特别是韩愈的接受研究和韩学学术史研究提供微不足道的文献资料。其二，之所以将韩文选本作为研究对象，亦考虑到韩愈的历史地位。韩愈作为古文运动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作家，后世对其推崇未曾间断过。其在明代虽然不如在宋代般受人尊崇，然而韩愈还是明代选家们热衷的选录对象。明代有以唐顺之、茅坤为首的“唐宋派”，以及稍后的归有光都对韩愈文章推崇备至，皆不约而同地在他们所编选的古文选本内选录韩愈散文。

明代文人对韩愈的接受基本上沿袭宋元，但受到明代当时鼓吹文学复古的学风与世风的影响，对韩集的整理与研究，无法与宋代之时相媲美。对于明代的韩集状况，万曼在其《唐集叙录》略有概述。¹⁵然而万曼《唐集叙录》一书中所言仅涉及韩愈别集在明代的流传状况，对明代之际的选集状况则无多加说明。

明代作为选本的鼎盛时期，当时所产出之选本数量繁多。本论文所论选本以明代唐宋派三人所收录韩愈诗文的选本为主，即唐顺之《文编》、

¹⁴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4195-420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5255-5265。

¹⁵ 万曼，《唐集叙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页231-232。

归有光《文章指南》、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从韩愈选本的分类而言，《文章指南》、《文编》则属于总集类的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属于八大家类的选本。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年二十三，举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改庶吉士。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明史》卷二百零五有传。¹⁶茅坤（1512-1601），字顺甫，归安（今属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青阳、丹徒二县，迁礼部主事，移吏部稽勋司，坐累，谪广平通判。年九十，卒于万历二十九年，鹿门为其别号，《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有传。¹⁷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昆山（今属江苏昆山）人。九岁既能写文，弱冠便精通《五经》、《三史》，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授长兴知县。后调顺德通判，专辖马政。明世，进士为令五迁倅者。隆庆四年，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卒官，《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有传。¹⁸

郭英德谈及明代之际的文学观念时，曾言其为“从师古走向求真，由求真归于言情……特意表明古代文学典范的格调，作为模拟的对象和创作的鹄的，以为这就能学其心而师其意了。”¹⁹元明时期的文学总集，特别是文学选本，除了具有文献价值以外，还兼有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郭英德认为选家乃是借助选文的机会来标榜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主张、审美

¹⁶ [清]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 5422-5424。

¹⁷ [清]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页 7374-7375。

¹⁸ [清]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页 7382-7383。

¹⁹ 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 423。

趣味，甚而借此在文坛上树帜角立。选家这些文学观念、文学主张和审美趣味不仅表现于选集的序跋或评点文字，也表现于所选的作家和篇目，这乃是编选原则的具体化。

元明人在评点文章多称格者，如标格、气格、骨格、品格、意格、体格、句格、格力、格式等；称调者，如气调、意调、风调、律调、音调、句调等。这些常用的评点词语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其中一种类型如体格、句格、律调、音调等，主要指称诗文的体裁、句法、音韵、声律等外在的形式；另一种类型如骨格、意格、气调、风调等，主要形容诗文内在的气度、意蕴。明代的选本大体也是延续了这一套的评点方式。

再者，明代为文学流派异常活跃的时期，不同派别之间的辩难此起彼伏。通过考究明代韩文选本中对于韩愈文章的接受与批评的不同声音，从中正可窥见明代派别之争。透过明代士人对韩愈诗文的贬抑或尊崇，亦可以窥见当时的文坛风气。与此同时，就同一学派内不同的代表人物所编选的韩愈选本，亦同时可窥探出同一学派之人物对韩文的态度及其文学观念是否相异。从学术思想史来看，透过明代文人，特别是唐宋派诸子对韩愈的接受态度，亦可作为呈现当时文学思潮的角度之一。但是，至目前为止，没有较为宏观的视野来建构明以降的韩愈接受研究，对韩愈在当时的历史定位的相关研究也较少，有待后人开发这领域。有鉴于此，本文对明代韩愈接受的梳理，以期为目前韩学史的研究贡献绵力。

然而，因著本人能力不足，范围有限，再加上文献搜罗上有所局限，本论文尚未能将明代唐宋派诸子，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三人以外所编选

的古文选本也进行论析对比。因此，未能更全面地建构出韩愈及其散文在整个明代散文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与影响。只能冀望日后再回头将此遗憾填补。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有关评点文学的源起与流变，孙琴安认为评点文学是一种由批评和文学作品组合而成又同时并存的特殊现象，具有批评与文学的双重含义。²⁰它既是一种批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文学形式；既是一种与文学形式密切相关、结合在一起的文学批评形式，同时又是一种含有批评成分、与批评形式连为一体的文学形式。孙琴安更认为古人在阅读文学作品之时，除了喜爱加评语以外，还喜欢在文学作品的题目或字里行间加上圈点，故有“评点”之谓。而所谓的评点之“点”，实际上就是圈点之意。它并不像“评”那样以明确的语言来做评判，论说高低，而是用一种符号来做提示或标记，通常有点和圈两种，也有用划线条来做标示的，宋人称为“抹”、“涂抹”或“抹笔”，其意义则与圈、点相同。孙琴安此番观点大体梳理了评点文学的发展源头。

针对选本批评研究，早期方孝岳曾如此指出：“研究文学批评学的人，往往只理会那些诗话文话，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总集了。其实有许多诗话文话，都是前人随便当作闲谈而写的，至于严立各人批评的规模，往往都

²⁰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页1。

在选录诗文的时候，才锱铢称量出来。”²¹为此，不少学者都陆续发表有关选本批评的研究论著，有：杨松年《中国文学批评论集》²²、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²³、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²⁴、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²⁵、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²⁶、王兵《古代文学选本批评效能的影响因素》²⁷、李凯《宋代总集编纂与文学批评》²⁸、樊宝英《选本批评与古人的文学史观念》²⁹、方志红《选本批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之一》³⁰等论述皆从选本批评的角度对选本的文学价值及其方法论进行挖掘。

就选本所选的韩愈诗文研究，过去一直都不受到较多的关注，目前仍是学界一块有待后人发掘的园地。近些年来，仅有几位学者曾发表以研究韩愈选本为主题的期刊论文以及学位论文，譬如：姜云鹏《明代韩愈古文选本概述》³¹、《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³²，全华凌《论宋人选编韩文学术标准的嬗变》³³、《明代士人接受韩文述论》³⁴、《论唐宋派对韩文的

²¹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页20。

²² 杨松年，《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²³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

²⁴ 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

²⁵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²⁶ 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²⁷ 王兵，《古代文学选本批评效能的影响因素》（《滁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四期），页21-23。

²⁸ 李凯，《宋代总集编纂与文学批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一期），页40-44。

²⁹ 樊宝英，《选本批评与古人的文学史观念》（《文学评论》2005年第二期），页46-51。

³⁰ 方志红，《选本批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之一》（《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十二期），页31-33。

³¹ 姜云鹏，《明代韩愈古文选本概述》（《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一九一期），页122-125。

³² 姜云鹏，《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³³ 全华凌，《论宋人选编韩文学术标准的嬗变》（《求索》2011年12月），页197-199。

³⁴ 全华凌，《明代士人接受韩文述论》（《理论与创作》2010年3月），页119-123。

接受》³⁵，张智华〈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文论〉³⁶，孙琰《韩愈诗歌的选本接受研究》³⁷等。

姜云鹏的两篇论文，前者只对明代韩愈的古文选本做概述，其将韩文选本归类成三种，可惜论文并无探究各个选本之异同与特色。³⁸姜云鹏的博士论文《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则论述从宋至清流传的韩愈别集、总集与选集对韩愈古文的评点。其论著仅围绕韩文评点展开，论述通代韩集对韩文之评点极详，对韩文选本中所选录韩文数量及篇目则略过，无细论。姜云鹏的论著起着抛砖引玉之用，其用心收罗明代韩愈古文选本之功不可没，亦为后来有志于明代韩愈选本研究的学人提供深入研究的方便。

全华凌的〈论宋人选编韩文学术标准的嬗变〉一文论述了北宋初年、北宋中期、南宋前期与南宋后期选编韩文的标准从以“全正”“高古”转变成以“明义理切世用”为准则。全氏的〈明代士人接受韩文述论〉主要论述明代人所论韩愈文体及其对韩文文体之评价。此外，全氏亦将其多年对韩文接受研究的论著汇编成书，名为《清代以前韩愈散文接受研究》³⁹。此书涉及范围较大，全书分五章，梳理了从唐至明人士对韩愈其道其文的接受，其中不乏比较学人对韩文接受的异同。其中第四章更集中论述宋代韩愈散文善本观的演进及其古籍版本的意义和宋人选编韩愈散文学术标

³⁵ 全华凌，〈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一期），页53-55。

³⁶ 张智华，〈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文论〉（《文学评论》1999年第六期），页43-52。

³⁷ 孙琰，《韩愈诗歌的选本接受研究》（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³⁸ 姜云鹏将其搜列到的明代韩愈古文选本分成三类，即韩文专选选本、“四大家”类选本及“八大家”类选本。详文请见姜云鹏（2013），〈明代韩愈古文选本概述〉，《社会科学家》2013年3月第三期。

³⁹ 全华凌，《清代以前韩愈散文接受研究》（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

准的嬗变。其余篇章虽也有兼述韩愈传本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在于论述该编撰者的古文理论及对韩愈的继承与再创造。

张智华的〈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的文论〉着重点在于南宋人所编的古文选本：《古文关键》、《崇古文诀》、《古文集成》、《妙绝古今》、《文章规范》及从其所评选之文章中论述选家的文论。⁴⁰孙琰的〈韩愈诗歌的选本接受研究〉梳理明清时期的韩诗选本情况，论述极详。⁴¹前人论述韩诗在接受多以后人对其诗歌的模仿和再创造为主要论述据点，孙琰此论则从选本对韩愈诗歌的选录与评价状况来论及明清士人对韩诗在接受。

全华凌的〈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认为明代文人对韩文的接受有复杂的局面，并从文道观和文法论等多方面接受韩愈的理论。⁴²此外，刘真伦的《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及杨国安的《宋代韩学研究》也对宋元时期的韩集笺注情况与韩文流传都有颇细致的论述。⁴³

邹云湖的《中国选本批评》，以历时性的方式探讨各个朝代的主要选本，实乃一本选本发展史的研究论著；又如钟志伟的《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此书以“唐宋八大家”为主要对象，分析明清时期的选本；解国旺的〈论明代古诗选本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专论明代古诗选本的大量刊及主要成因有三：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潮、明代刻板业

⁴⁰ 张智华，〈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文论〉（《文学评论》1999年第六期）页43-52。

⁴¹ 孙琰，《韩愈诗歌的选本接受研究》（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⁴² 全华凌，〈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一期）页53-76。

⁴³ 详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的发达及明人喜结诗社。解氏更以为明代古诗选本与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紧密相连。⁴⁴

从选本批评的角度而言，对韩愈选本的研究不仅仅就选本评点，还有就选本所选之韩文篇目与数量。除了梳理选家之评韩文，亦要论述选家之所以选此韩文篇章。虽然姜云鹏与全华凌对明代士人所评韩文论述详细，却对明代选本之选录韩文没有多加评论，未免有点论述不周。

至于对唐宋派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以来也陆续被学者所关注。专论类型如：钱基博在《明代文学》第一章第九节中就曾谈及唐宋派诸子（王慎中、茅坤、唐顺之和归有光）及其文学主张。⁴⁵批评史类的论著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文学通史类的则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章培恒和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等论著中的部分章节都对唐宋派的文学思想作了相对全面的阐述。对唐宋派的研究，目前学界大体的重点都是放在对唐顺之和茅坤的文学主张的探讨之上，如：熊礼汇的《明清散文流派论》中第五章的《唐宋派论》⁴⁶、黄卓越的《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⁴⁷以及黄毅的《明代唐宋派研究》⁴⁸等论著。

然而针对唐宋派对唐代韩愈散文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特别是以唐宋派的选本中对韩愈文章的选录去探究其对韩文的接受与

⁴⁴ 以上详见钟志伟，《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台湾：文津，2008）；解国旺，〈论明代古诗选本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电影评介》2007年第二期），页87-89。

⁴⁵ 钱基博，《明代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页37-52。

⁴⁶ 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页292-327。

⁴⁷ 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⁴⁸ 黄毅，《明代唐宋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继承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可见的相关论著除了上文所述的全华凌的〈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及〈明代士人接受韩文述论〉二篇以及姜云鹏的〈明代韩愈古文选本概述〉，另有沈思的〈唐宋派对韩愈文论的继承与发展〉、夏咸淳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与明代唐宋派〉、孙彦的〈从《文编》看唐顺之的“文法”说〉、冯小禄和张欢合著的〈从论争看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建设和文派要求——以茅坤为中心〉⁴⁹等。前者主要梳理唐宋派的文论观与韩愈文论的联系与继承，并无提及唐宋派选本对韩文选录情形，后二者的论文中部分段落提及其对韩愈文论的接受。

目前学界对唐宋派选本的研究，多集中于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为主，除了上文所罗列的几篇，尚有计有林春虹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与茅坤的文统观〉、付彬彬和付琼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茅著本考录〉、黄毅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述评〉、梅篮予的硕士学位论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渊源与流传考论》等。目前学界对《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版本传播、编纂目的、茅坤的文论皆有非常详细的研究。对唐顺之《文编》的研究论著则有姜云鹏的〈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李德锋的〈唐顺之“六编”编纂体系的思想解构〉等。至于归有光的《文章指南》在目前学界仍不受备注，目前只有陈禹齐的硕士论文《归有光论文章体则与其作品研究》。

纵观而言，韩愈选本的研究，特别是明代的韩愈散文选本，尚有很大的空间待专家学者前去发掘，是日后可以扩充发展研究的范围。这一方向

⁴⁹ 冯小禄、张欢，〈从论争看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建设和文派要求——以茅坤为中心〉（《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二期），页59-63。

的完成有助于学人很好地去掌握韩学对后世的影响，更能窥探出后世文学家的文路发展与继承。就研究意义而言，对选本的研究，不仅探讨选家的文学主张，还能理解选家如何重新形塑作者，对相关作品再诠释，而就选本本身的影响力，也可以侧面观察当时的文学思潮。

第三节：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关于“选本”的概念，邹云湖就曾指出选本“顾名思义就是经过选择的文本”。⁵⁰张伯伟也曾以《诗经》为范列，列出了选本批评的评选机制。张伯伟认为选本评选的机制一共有三种类型，第一为选本皆有一定的评选标准，其次为选本多有序文，第三为辩体及次序。⁵¹王兵则认为选本的序跋与选本的评点是属于有形的批评，谓之选本的显性批评，而选家的选文属于无形的批评，谓之隐形的批评。王氏进一步言及选本的这种批评属性是其他批评样式所不具备的，不但拓宽了批评的渠道，也在无形中影响了读者对选家批评意识的接受。⁵²

纵观上述几部有关中国选本的评选论著，足以见得选本批评在理论上可分成三种形态，即：选本的序跋、选本的评点和选家的选文。选本的序跋集中地表达了选家的文学思想；选本的评点散金碎玉式地表达了选家的

⁵⁰ 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也说：“此后它（选本）就与其他后来出现的各种诗话、笔记、评点、序跋等极富民族特色的批评方式一起，一直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批评职能。”

⁵¹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页 280-283。

⁵² 王兵，《古代文学选本批评效能的影响因素》，页 21。

批评理论。但这两者均可见于文字材料，直接地表露选家的文学观点。选文则是通过选家主观的选择行为来实践自己的文学批评。选本中入选的作品本身就蕴含着选者的文学思想和批评理论。

目前学界也有不少论著正使用了此种“选本”的研究机制来对各朝代的诗文选本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与分析，如林滢的〈从南宋三选本溯“唐宋八大家”原貌〉⁵³、何水英的〈从选本批评看宋初唐诗学的演进——基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的比较〉⁵⁴、王婧文的《南宋古文选本批评研究》⁵⁵以及仇小屏的《吕祖谦〈古文关键〉文章论研究》⁵⁶等。以上的研究论著皆运用了选本的批评机制来进行研究，从所论析之选本勾画出选家的评选标准与其文学观点，乃至对某时期的文学发展进行补充。

综合上文所提及的选本批评理论，本论文的撰写离不开《文章指南》、《唐宋八大家文钞》、《文编》三本选本的序跋、选本的评点以及其选文。前二者为选家们对韩文及其自身的文学理念的显性表现，后者为选本及选家文学理念的隐形再现。

本论文以韩愈及其诗文为主线，探讨明代文人，特别是唐宋派诸子对韩愈诗文的接受与理解。他们所接受的韩愈未必与中唐时期或两宋时期的韩愈形象一致。因此，本文会在论述里说明他们对韩愈形象接受之不同、

⁵³ 林滢，〈从南宋三选本溯“唐宋八大家”原貌〉（《北方文学》2011年12月刊），页130-131。

⁵⁴ 何水英，〈从选本批评看宋初唐诗学的演进——基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的比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月），页181-185。

⁵⁵ 王婧文，《南宋古文选本批评研究》，中国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⁵⁶ 仇小屏，《吕祖谦〈古文关键〉文章论研究》（台北：万卷楼，2010）。

对其诗文的诠释与当时社会、政治或文风的联系，作为探讨的方向。本论文将分成以下四个章节分别论述之。

本文的第二章〈明代唐宋派古文选本述略〉主要对唐宋派诸子所编选的选文：《文章指南》、《文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作出基本而通盘的了解，首先便要注意这些选本的整个发展过程，即是促成此类选本出现的因素，讨论选者的成书原因与过程。进而，观察本论文所选录之三本选本的体例特色，并追溯三位选家的生平背景与身份，对明代韩愈古文选本与选家有初略概念。观察各选本所呈现的体例，并举出其特色，可以借以与实际批选内容相对照。所有选家对其选本皆有主观认定的存在价值，即选本的之目的性，也就是选本为选家表达的终极意义。而选本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目的是多向性的，如：教育、科举、自娱、补救流弊、张扬思想等，而明代以来，韩愈相关的选本不断地出现与盛行，显然与整个社会文化思潮有关，是符合人们高度期待的产物而历久不衰，故其选本的目的的探求，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诗文选本的存在目的远远比戏曲选本或小说选本来得严肃、正经，不会是仅仅为了自娱娱人或存遗等目为宗旨。

至于第三章〈归有光《文章指南》之录韩文考辨〉主要以归有光的《文章指南》中所选录之韩文及其对韩文之评点，进一步分析选者对韩文之接受与理解，亦尝试结合选者的文论观与其评点之联系。第四章〈唐顺之《文编》之录韩文考辨〉以及第五章〈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录韩文考辨〉亦复如是。选家不仅仅只是一篇文学作品的批评家，也更是作品的诠释者。

透过分析归有光、唐顺之及茅坤三人所评论的韩愈散文，可了解韩愈从唐宋乃至明清所反映的现实意义及其身份地位的转变。此三章将深入了解各选本的评点情况，因为评点可以展现选者的好恶观感，评点也提供选者与读者之间最直接的交流平台。对所选之相同的韩文篇章所给予的批点比较论述。从中看出就同样的一篇韩愈文章于明代不同时期不同的选家，其所表现的文学看法与主张。选家往往主宰了选本的面貌，而其生平与学术主张，更是左右了选本里头批语的深度。既然选本所选为佳作，选者依照他的评选标准所选出的文章，再加上评点符号及评语，而这些尽是归有光、唐顺之和茅坤三人文学批评思想的一种展现。明代选本的刊行往往也与当时的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或有关系。因此，本论文除了谈及三位选者的文学主张以外，当时相关的文学思潮也须一拼作出讨论，以明白个中联系。

第二章：明代唐宋派古文选本述略

自南宋开始以降，结合评点的文章选本即已面世，诚如黄宗羲在其《南雷文定凡例四则》中所言：“文章行世，从来有批评而无圈点，自《正宗》、《轨范》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编》、鹿门《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点出以便读者，非以为优劣也。”¹明代的选本亦深受宋代选本之评点机制的影响，所使用的评点体系亦与宋代选本大同小异。古文家认为凡为文必有其文章体则，欲写作一“体”的文章，当有其一定之规则必须遵守。是故，本篇将就明代三位唐宋派代表人物——归有光、唐顺之、茅坤及他们所选评的选本作一评析扼要简介，梳理出选本的编选目的以及其编选和评点的机制。

第一节：归有光与《文章指南》

归有光所编选的《文章指南》共五卷，纪昀在其《四库全书总目》中记《文章指南》言及：

旧本题明归有光编……有光登第后，授其同年南海知县詹仰庇，仰庇以授其友黄鸣岐，鸣岐校而刻之为题此名。然此实钞本，非其原刻。凡分六十六则，由《左传》以下迄于明，录文百十八篇，每则每篇皆有评说，而以总论看文字法冠于卷端。间杂以骈体，如〈北山移文〉、〈归去来兮词〉之类，盖乡塾教授之本，殊

¹[明]黄宗羲，吴光 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十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页 684。

不类有光之所为。考旧本《震川集》末有其族孙跋语，称有光选韩柳文有刻本，为俗人篡改，非复原书。又王懋竑《白田杂着》有〈跋归震川史记〉一篇，称所见武陵胡氏、桐城张氏诸本迥乎不同。且称有光文集为其后人删改，至见梦于坊人翁某。况此点次本子独存其家，岂无所增损改易云云。是有光手定之书，尚且全非其旧。则此晚出选本，不足为信，更不待深诂矣。¹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中认为归有光的《文章指南》乃係“乡塾教授之本，殊不类有光之所为”，因此怀疑此书并非归有光亲身所作。此外，《四库全书总目》中亦曾提及“仰庇以此书授其友黄鸣岐，黄鸣岐校而刻之为题此名”此事，而明代的詹仰庇²在其〈文章指南序〉中亦曾提及：

鸣岐志欲嘉惠天下，命余芟其鲁鱼亥豕之讹，题曰《文章指南》……若夫要总于前，而大纲以举；类分于后，而细目以张。记其则，则六十六条。³

此外，詹仰庇谓：“乙丑春，震川归先生登进士第，余辱附骥尾。诸年家唯先生爱余笃至，每日相与追论举业利病，先生深谓读古文有益，余意其必有善本，少之果出古文一帙示余曰：‘余之幸至今日者，赖有此耳。’余阅有得，辄叹获覩之晚，于是录之以为继武者之的也。”通过以上詹仰庇寥寥数语已能确实肯定了《文学指南》当为归有光所编选。目前

¹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1751。

² 詹仰庇，字汝钦，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由南海知县征授御史，后为左副都御史，稍迁刑部右侍郎。移疾归，久之卒。《明史》卷二一五有传。见[清]张廷玉，《明史》卷二一五，页5678。

³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5册（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页624。

已有学人通过研究考证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言纯属臆测。⁴按詹仰庇于序中所言，归有光的《文章指南》当为平时阅读所得，将多年心得汇编成集，并授予他人作文之法。

《文章指南》现存版本有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清光绪二年古歙许佐皖江节署刻本，半叶九行，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边，封面刻“归震川先生选本”、“文章指南”、“许筱莲搜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据为此本。另有台湾“中央属图书”藏旧钞本，正文首行题“归震川先生古文选”，书根题“批本文章指南”，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台湾广文书局所出版的《文章指南》所据为此本。

《文章指南》一书虽无归有光原序，难以察见其选文目的，但书前附有〈归震川先生总论看文字法〉、〈看历代名家文法〉、〈论作文法〉、〈论文章体则〉四篇，前三者几乎承袭自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一书，并无多少更动，惟在论述历代名家文法时，归有光增加了春秋左氏、汉司马迁、班固及明王阳明几人，进一步地扩充了吕祖谦原有的选录范围。⁵除却前三者，惟独〈论文章体则〉乃归有光自己撰写，为此书独录，是他的文学理论精华所在。特兹在下文依照归有光在〈论文章体则〉中所阐述的文学理论，梳理此书的选文体例与评点机制：

⁴ 陈禹齐曾于其学位论文通过分析詹仰庇上述序文，认为《文章指南》当是归有光在安亭讲学二十余年的教本，虽不是出自归氏本人手着，也应是其学生所记，并大量保存了归氏评论分析文章的要点。（陈禹齐：《归有光论文章体则与其作品研究》，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0，页74。）此外，杨峰通过将《文章指南》中所使用的措辞与归有光文章及其他文章选本的论述相结合比较之下，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处，大意相同，实为同一人之论说与想法，并以此推断出《四库全书总目》所言纯属臆测。（杨峰：《归有光研究》，中国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页16-18。）

⁵ 此外，吕氏《古文关键》除了“看韩文、柳文、欧文、苏文法”以外，尚有“看诸家文法”谈论“曾文、子由文、王文、李文、秦文、张文和晁文”。详见[南宋]吕祖谦评，[清]徐树屏考异：《古文关键》，台湾：广文书局，1970，页18-20。

一、编纂体例与评点机制

《文章指南》全书共分为“仁、义、礼、智、信”五集，一共收录了一百二十篇文章，三十三位作家，年代从春秋战国至明朝，尤甚看重唐宋作家之文，而其中又以韩愈文章数量为最，共有二十六篇，苏轼文章紧随其后，共二十一篇。⁶下表为归有光《文章指南》所选录的作者与选文一览表：

表 1：《文章指南》作者与选文数量一览表

序号	作者	仁集	义集	礼集	智集	信集	总篇数
1	班固					1	1
2	程颐	1					1
3	独孤及		1				1
4	杜牧					1	1
5	范仲淹				1		1
6	方孝孺	1					1
7	韩愈	1	13	2	6	4	26
8	胡铨	1					1
9	贾谊			1		2	3
10	孔稚珪	1					1
11	乐毅	1					1
12	李观	1					1
13	李华			1			1
14	李斯	1					1
15	柳宗元		3	3	2	2	10
16	吕祖谦					1	1
17	欧阳修		1		2	4	7
18	钱公辅			1			1

⁶ 《四库全书总目》谓《文章指南》“录文百十八篇”，然广文书局出版的《文章指南》实际收录了百二十篇，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多了两篇。《文章指南》仁集共录 22 篇文章；《四库》本却是 20 篇，《四库》本将苏轼的两篇前后〈赤壁赋〉列为附录，并无计算在内。

19	司马光				1		1
20	司马迁	1	1				2
21	宋濂			2		1	3
22	苏轼	4	4	3	3	7	21
23	苏洵	1	3		1	5	10
24	陶潜	1					1
25	夏竦			1			1
26	杨雄	1					1
27	王守仁	2		1	4	1	8
28	王祜			2		1	3
29	王禹偁		1				1
30	曾巩	1					1
31	战国策			1			1
32	诸葛亮	1		1			2
33	左丘明	2	1	1			4
	总数	22	28	20	20	30	120

归有光在此书中就所选录的篇章分别加以评点与分析，以下就书中所选录的作家按其朝代分类与收录篇数录于下表：

表 2：《文章指南》作家选文篇数

朝代	选文作家与篇数	
先秦	李斯（1）、左丘明（4）、乐毅（1）、战国策（1）	7 篇
两汉	司马迁（2）、杨雄（1）、贾谊（3）、班固（1）、诸葛亮（2）、	9 篇
魏晋南北朝	孔稚珪（1）、陶潜（1）	2 篇
唐代	韩愈（26）、柳宗元（10）、独孤及（1）、李华（1）、杜牧（1）	39 篇
宋代	苏轼（21）、苏洵（10）、欧阳修（7）、程颐（1）、胡铨（1）、李觏（1）、曾巩（1）、王禹偁（1）、夏竦（1）、钱公辅（1）、范仲淹（1）、司马光（1）、吕祖谦（1）	48 篇

明代	王守仁（8）、宋濂（3）、王祜（3）、方孝孺（1）	15 篇
合计		120 篇

从上表可见,《文章指南》收录的篇章作家主要以唐、宋两代为主,分别占了三十九及四十八篇之多。这不得不让人将之与唐宋派主张师法唐宋散文的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

归有光在《文章指南》一书中所使用的评点包括“提下批”、“旁批”、“眉批”及“评论符号”。提下批,为提示每篇文章的体则;旁批,则是归氏对相应语句的评语与分析;眉批,则是对相关段落的大意论述,更多是归氏自己的阅读笔记。

至于书中所使用的评论符号则有四种类型,即:字旁小斜点“、”、字下右折短直线“L”、字旁小圆圈“○”、字下直线“—”。旁批几乎每篇都有,而评论符号中,“L”和“—”几乎每篇都会出现,至於“、”出现的篇数较少。⁷归有光在评选文章时,惯性使用“—”符号;来标志文章的分段;以“L”符号来标志文章大意的转折;使用“○”、“、”此二符号来标志文章关键词句,警策之句。

二、文章体则

《文章指南》全书共分六十六条〈论文章体则〉,各体则皆有选文与评说,其中更保留了归有光分析文章与其授业教学之教本。下表为《文章指南》中各集数及其体则的分类:

⁷ 《文章指南》所选录的二十六篇韩文中,〈杂说一〉、〈应科目时与人书〉、〈对禹问〉、〈送石处士序〉无旁批;而〈应科目时与人书〉、〈上张仆射书〉、〈师说〉、〈送董邵南序〉、〈送孟东野序〉、〈与陈给事书〉、〈代张籍与李浙东书〉、〈获麟解〉、〈送石处士序〉无“L”;〈杂说四〉无任何评点符号。

表 3:《文章指南》集数及体则分类

集数	体则	
仁集	通用义理则、通用养气则、通用才识则、通用关世教则、通用占地步则、立论正大则、用意奇巧则、遣文平淡则、造语苍劲则、叙事典瞻则、词气委婉则、神思飘逸则	12 则
义集	譬喻则、引证则、将无作有则、化用经传则、引事论事则、抑扬则、尚论成败则、一正一反则、正反翻应则	9 则
礼集	前后相应则、总提分应则、总提总收则、逐事条陈则、文势层叠则、句法长短错综则、一级高一级则、一步进一步则、势如贯珠则、势如走珠则、文势如击蛇则、文势如破竹则、先虚后实则、先疑后决则	14 则
智集	上句载下句则、缀上生下则、叠上转下则、拦截上文则、设为难解则、含意不露则、设为问答则、辨史则、文短气长则、字少意多则、字烦不厌则、双关则、两柱通文则	13 则
信集	下字影状则、相题用字则、题外生意则、驳难本题则、回护题意则、驾空立意则、死中求活则、立意贯说则、缴应前语则、叠用缴语则、结意有余则、竿头进步则、结末括应则、结末推原则、结末推广则、结末垂戒则、结句有力则、结末断制则	18 则
合计		66 条

陈禹齐在其硕士论文《归有光论文章体则与其作品研究》里将归有光《文章指南》内的〈论文章体则〉六十六条体则分门别类为相题立意、链字锻句及安章布势三种。⁸此外，谢无量在其《实用文章义法》一书亦采用

⁸ 在其分类之下，“相题立意”底下有“文章本质论”与“立意论”。义理之说、养气之说与才识之说为“文章本质论”；立论正大、立意贯说、题外生意、驳难本题、回护题意、驾空立意、用意奇巧、死中求活、设喻立意（即譬喻则）与托事理论（即下字影状则）为“立意论”。“链字锻句”之下则有“链字法”与“锻句法”。“链字法”有遣文平淡、造语苍劲、叙事典瞻、辞气委婉及字烦不厌；“锻句法”有叠上转下句法、下句载上句法、拦截上文句法、长短错综句法、双关句法、文短气长、含意不露、文势重叠、文势如贯珠、文势如走珠、文势如击蛇及文势如破竹。“安章布势”之下有“谋篇布局”及“结法布局”。“谋篇布局”有引证古义、持论要法、抑扬两用、一正一反、正反翻应、前后相应、总提分应、总提总收、逐事条陈、一级高一级、一步进一步、先

了归有光《论文章体则》的分类，并将归氏的文章体则细分成总论、文意论、文势论、字法及句法与篇法论五大类。⁹陈禹斋的分类与谢无量相似，惟谢无量将相题立意分别为总论与文意论，安章布势细分为文势论与篇法论。

特兹结合二者之说法将归有光六十六条论文章体则尝试分类，见于下表：

表 4：《文章指南》六十六条体则及其分类

六十六条体则				
通论	立意论	结构论	引证论	修辞论
义理则 养气则 才识则 关世教则 占地步则	立论正大则 立意贯说则 相题用字则 题外生意则 驳难本体则 回护题意则 驾空立意则 用意奇巧则 死中求活则 神思飘逸则	先虚后实则	引证则 引事论事则 化用经传则 将无作有则 尚论成败则 辨史则	遣文平淡则
		先疑后决则		造语苍劲则
		譬喻则		句法长短错综则
		前后相应则		文短气长则
		两柱通文则		叠上转下则
		总提分应则		下句载上句则
		总提总收则		拦截上文则
		正反翻应则		字少意多则
		一反一正则		字烦不厌则
		逐事条陈则		双关则
		文势重叠则		辞气委婉则
		文势如贯珠则		
		文势如走珠则		
文势如击蛇则				

虚后实、先疑后决、缀上生下、设为问难、字少意多、缴应前语及叠用缴语；“结法布局”有结意有余、竿头进步、结末括应、结末推原、结末推广、结末垂戒、结句有力及结末断制。详细论述请见陈禹齐：《归有光论文章体则与其作品研究》，页 34。

⁹ 谢无量其在书内将养气、神韵、义理、识力、关系世教、自占地步及文体平正归类成“总论”。“文意论”则包括了设喻立意、借事立意、立意贯说、驾空立意、驳难本题及含意不露。“文势论”则有正反翻应取势、文势层叠、文势如贯珠、文势如走珠、文势如击蛇、文势如破竹及文短气长。“字法及句法”有全篇用一字变化法、叠上转下句法、下句载上句法、句法长短错综及双关句法。“篇法论”有叙事典瞻、词气委婉、引证古义、持论要法、一反一正、前后相应、总提分应、逐事条陈、一级高一级法、先虚后实法、先疑后决法、缴上生下法、设为问难法、字少意多、用缴应语法和结法。详见谢无量：《实用文章义法》，台北：华正书局，1974。

		文势如破竹则 下字影状则 抑扬则 叙事典瞻则 叠用缴语则 一级高一级则 一步进一步则 设为难解则 设为问答则 含义不露则 缀上生下则 缴前应语则 结末括应则 结束断制则 结末垂戒则 结末推原则 结意有余则 结末推广则 结句有力则 竿头进步则		
--	--	---	--	--

所谓“通论”即是文章的本旨，按谢无量所言：“唐宋以来之实用文学，非但主于铺叙事情，明白易晓而已，又有其所以为文之大本。”¹⁰如此看来，“通论”所指的即是文章的本质，在其《文章指南》中共有五则。所谓“立意”即是根据文章题目的意义，建立其中心思想，立下全文的主旨。欲为文，须先立意，方可寻思，安章谋篇。归氏在《文章指南》中谈论“立意”共有十则。

所谓“结构”即是将内容题材作有效的安排，使之发挥最大效果，亦可称之为“布局”、“架构”。一篇文章的结构一般可分作：开头、正文、

¹⁰ 谢无量，《实用文章义法》（台北：华正书局，1974），页5。

结尾三部分。相较于其他的体则，归氏在此一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其论述“开头”的体则有：“先虚后实则”及“先疑后决则”两种开头方式。

对于“正文”的结构写作法则，其提出了：“譬喻则”、“前后相应则”、“两柱通文则”、“总提分应则”、“总提总收则”、“正反翻应则”、“一反一正则”、“逐事条陈则”、“文势重叠则”、“文势如贯珠则”、“文势如走珠则”、“文势如击蛇则”、“文势如破竹则”、“下字影状则”、“抑扬则”、“叙事典瞻则”、“叠用缴语则”、“一级高一级则”、“一步进一步则”、“设为难解则”、“设为问答则”、“含义不露则”、“缀上生下则”，一共二十三种叙述方式。至于“结尾”，归有光则提出了九种结束文章的手法。

所谓“引证”即是为文论说之时，为了使人信服，须有例证。归有光在书中提出六种引证的方式。最后则是“修辞”，归有光亦看重文章语辞的修饰以及文辞的表达方式，他提出了十一种修辞的方式。

以上为归有光《文章指南》一书的编撰体例与评点机制之概述简介。下节会讲析唐宋派另一主要人物——唐顺之及其所编选的《文编》。

第二节：唐顺之与《文编》

唐顺之作为明代唐宋派的翘楚，主张“文必有法”，并通过编选古文选本对其所选录的古文进行评点，来阐述其文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唐顺之辑《文编》六十四卷，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排纂，分为制策、对、谏疏、论疏、疏、疏请、疏议、封事、表、奏、上书、说、札子、状、论、年表论断、论断、议、杂着、策、辞命、书、启状、序、记、神道碑、碑

铭、墓志铭、墓表传、行状、祭文，共录一千四百二十二篇文章。

其中先秦两汉的文章共收录了三百四十六篇，魏晋六朝的文章只有二十三篇，唐宋两代的文章则多达一千五十三篇，占据了选文的绝大部分，而这选录的唐宋文中几乎也全为八大家之文。《四库全书总目》曾谓此书因为收录范围过于广泛，义例太多，故在其篇目抉择与分体中导致纷杂的结果，部分习见典范之作未见有收录其中。

唐顺之在退隐之时曾经一度热衷于撰文指导学子举业为文，他所编选各类的选本，其中包括《文编》的编选都包含了他“文以明道”的理想，想要通过文学来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其实唐顺之本人喜爱编选工作，他曾经编选过的集子从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并会对其所编选的作品附上评点，如：《左编》、《右编》、《稗编》等。与《文编》相同，四库馆臣虽也把这些作品收录其中之际，却把唐顺之于书中原本的评点一概省去。

《文编》今存有版本，即明嘉靖间福州知府胡帛校刊本（简称“胡本”）与明天启元年陈元素重订本（简称“陈本”），而《四库全书》所用的底本为陈元素之重订本，并将陈本之批点及评语皆略去。¹¹姜云鹏在其《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中认为陈元素本应非原本，乃于胡帛本面世后，对胡本所选文章篇目再进行删减。¹²姜云鹏在其《唐顺之古文评点

¹¹ 《四库总目》卷一八九曾提及：“阎若璩《潜邱札记》有《与戴唐器书》，述宋实颖之言曰，荆川才大如海，评书有详有略，惟《文编》出陈元素者，非其原本。又称两本舍下俱有，他日呈寄，自知之云云。今世所行惟此一本，其为原本、陈本，不复可考，要其大旨固皆出于顺之也。”（《四库全书总目》下册，页 1716）此处所言“两本”应当为胡刻本及陈重订本，王重民在其《中国善本书提要》一书中均有收录。姜云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以胡帛刻本及陈重订本对照《四库》版本，发现陈重订本的选文比胡本来得少，而《四库》本的选文与陈重订本相同，以此推断出《四库》本所依据的版本为陈重订本，见姜云鹏：《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页 68-69。故此，本文所用唐顺之《文编》乃以胡本及《四库》本，两者参照。

¹² 姜云鹏，《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页 9。

初探——以《文编》为中心》中也尝试比较了胡本与陈本之异同。¹³从所选录的篇目来看，陈本收录的篇章数量比胡本少，胡本的评点方式也比陈本来得更为丰富，但是从所收录的批语来看的话，则陈本比胡本来得多一些。

唐顺之的《文编》前附有序文，清楚交代了他编选的缘故与标准，故兹在下文梳理其书的体例与评点机制：

一、编纂体例与评点机制

四库馆臣以为唐顺之选录《文编》主要目的是在于“标举脉络，批导窾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蘄于古”，以便使“古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¹⁴唐顺之编选《文编》的目的在于阐明为文之法度，让学文之人得以此为“门径”。

《文编》编选文章的方式大抵有三：一是在大的文体之下，或据其内容，或据其风格，分成小类、二是将同一文体下的文章，据其风格差异，进行对比以显其行文特点与艺术面貌、三是将同一文体的文章，或据其时代顺序，或据其文体发展变迁而编次。¹⁵其书所收录的文章虽浩瀚，却是“有章可循”。

《文编》的编纂主要是宣扬唐顺之的“文法”观念，如其在序文言及：“然则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圣人以

¹³ 姜云鹏，〈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页 133。

¹⁴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下册，页 1716。

¹⁵ 姜云鹏，〈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页 70。

神明而达之于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其窥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驳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尝不在焉。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学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¹⁶唐顺之以为“文”必有其“法”，两者是无法分割。唐顺之正是透过书中出现的“点”和“评”来阐述所谓的“文法”。本论文将于第四章第三节中再细谈唐顺之的为文之“法”，此处暂且略过。

明代徐师曾于其《文体明辨序说》载有“大明唐顺之批点法”：

长圈	○○○○○○○○	精华
短圈	○○	字眼
长点	、、、、、、、、	精华
短点	、、	字眼
长虚抹		敝
短虚抹		故事
抹		处置
撇		转换
截	—	分段 ¹⁷

徐师把唐顺之常用的评点方式总结为以上九种类型。依次参照《文编》其他版本中的评点符号，胡本所使用的批点符号主要有“抹、撇、长点、断点、截”五种，“长圈”和“短圈”这两种符号偶尔有之，其中使用最

¹⁶ [明] 唐顺之，《文编》（明嘉靖福州知府胡帛校刊本，1522-1566），页 1-2。
¹⁷ [明] 吴纳，[明] 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台北：泰顺书局，1973），页 97。

多的符号乃是“抹”。若依照徐师曾上述的讲解说法，“抹”表示“处置”，意即用此符号以标出文中的主题句及带有结论性或总结性的字句。至于表示“转换”的“撇”，在胡本中多出现在文章句首，“短虚抹”表示“故事”，即是标出文中的用典及其所征引之古例。“长圈、短圈、长点、短点”皆是用以表示一篇之精华或字眼。可见，唐顺之使用的批点手法相当丰富。

归有光《文章指南》及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亦使用了相似的评点方式，由是可见这种评点方式应该是明代坊间已经盛行的批点法。若较之与评点发展初期宋代的几种古文选本，如吕祖谦《古文关键》和楼昉《崇古文诀》，宋代的批点方式仅以抹和截二种为主，尔后从谢枋得《文章规范》才开始使用圈和点的方式评点，足见明代的古文选本所使用的评点更为精细。

若再从“评”的方面来看，唐顺之的评语简洁，虽着墨不多，却字字精要，评定的方式主要以首批、旁批及尾批来进行。首批，主要是点示出文章的文体特征、结构特色、运用的笔法及艺术特色。唐顺之常用“某某格”一词，用以表示该文章的行文风格、结构特点。唐顺之的首批使用此种“某某格”的评点方式正与吕祖谦《古文关键》同，吕祖谦在其《古文关键》中亦多次使用此种方式来品评文章，如他在韩愈〈答陈商书〉一文首批曰：“设譬格”，在〈谏臣论〉首批曰：“意胜反题格”等。至于旁批，主要是用来点明文章主题句或行文的起承转合部分，也针对文章之中关键语句给予阐发。尾批，则是对文章整体结构和大意的总结。

以上皆是唐顺之《文编》之编纂体例与评点机制梗概。下一节讲析最

后一位唐宋派的代表人物——茅坤以及他所编撰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第三节：茅坤与《唐宋八大家文钞》

有关《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版本流传问题，付琼《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明清期的衍生和流行》以及其与付杉杉联名撰写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茅著本考录》，还有梅蓝予《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渊源流传考论》这几篇论文中均有论述。¹⁸三人皆认为此书首由茅坤侄子——茅一桂开始雕刻于杭州，此为“茅一桂刻本”，即是《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初刻本。尔后崇祯元年（1628）时期出现方应祥刻本，接着崇祯四年（1631）出现的茅著刻本，而其中又以茅著刻本因对方应祥刻本有着多方吸收与采纳，成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影响最大的本子，《四库全书》亦是以此本为底本。

《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明万历七年（1579），这时期距离茅坤辞官职归还家乡的嘉靖三十四年也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而又距离茅坤根本转变文学观念的嘉靖二十六年则过了三十多年之久。在这期间，茅坤曾经致力于宣传古文的为文之道。《明史·茅坤传》记载：“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

¹⁸ 付琼：《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明清时期的衍生和流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7月第四期，页87-页91；付杉杉、付琼：《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茅著本考录》，《潮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1月第一期，页28-页34；梅蓝予：《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渊源与流传考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

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¹⁹茅坤擅长古文，最为折服的人物是唐顺之，而唐顺之喜爱唐宋诸家的散文，并著有《文编》一书，茅坤受其影响也编选了一部《八大家文钞》，后来此书亦在当时盛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对后来古文以及唐宋八家文的传播起了一定的影响。林春虹在〈茅坤评点的传播与刊刻形态的变迁〉一文中就从两方面来说明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后来古文和八家文选的影响。²⁰她从茅坤此书在明代中后期一直到清代都在不断地被重印和翻刻以及茅坤的古文评点被大量转引在后期的古文选本中来说明《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后世之影响。

虽然“八大家”的称呼并不是茅坤首创的，可是这一称号却是在茅坤此书之后广为人们所接受，并沿用至今。由是可见，《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一部古文选本，比起归有光的《文章指南》及唐顺之的《文编》两部同为唐宋派代表人物的选本在后世的流传度和接受度更为广泛。

有关此书的编选目的，纪昀在其《四库全书总目》评《唐宋八大家文钞》为“今观是集，大抵为举业而设”，“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亦足为初学之门径。”²¹茅坤编选这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固然有其现实功利的倾向，即是让时人掌握学习为文的技巧，特别针对要应试的科举考生，但是若深究其编选目的应该并不仅仅为了应试之文，应还有其实际的作用与编选目的。

随着近几年来，学界对逐渐重视八家之文的研究，就连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开始备受关注。学者在论及此书时对其编选目的却有不一

¹⁹ [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页7375。

²⁰ 林春虹，〈茅坤评点的传播与刊刻形态的变迁〉（《古典诗学》2016年12月）页50-57。

²¹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下册，页1719。

样的观点与想法。付琮认为茅坤的八家选本完全便是服务于举业之用，他在序中自称继承“庖丁以来人文不易之统”此番说辞仅仅是“门面之话”而已。²²林春虹则认为付琮此说法实际上是延续了清代学者的偏见，并进一步举出凡是与举业八股相关的作品、文章，清代学者皆都秉持排斥态度，就连带茅坤此部选本不受清人的赏识也不足为奇。²³这其实是清代学者看重“学问”轻视“文章”的一种直接体现。

除了付琮和林春虹的观点以外，更多学者则是保持折中意见，既认为《文钞》确实是为当时科举服务，也认为此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推动了唐宋派文学思想的传播。

正如本论文在绪论中所谈及，整个明代中期都是处于文学复古的阶段，发掘前代诗文的成就是明中期文人的首要职务，编选诗文选本也成了一时之风尚。唐宋派诸子的古文选本正受了此风气的影响，相继先后出世，这其中便包括了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要通过对唐宋文章进行编选和评点，使之流传于世有益于时文，以纠正时人为文的弊端。他在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时也不再只是从文章形式下手，而是重点在于揭示唐宋文章的潜在价值与内涵。这是因为唐顺之在当时虽然提出了“师法唐宋”的口号，但收益甚微，时人依然不能认识到唐宋散文的真正价值。与唐顺之关系甚密的茅坤便选择从“文以明道”的角度出发，想要先确立唐宋古文的正统地位，从而使时人认识唐宋散文的价值。

²² 付琮：〈唐宋八大家选本与明清文学教育的适配〉，《天府新论》2008年，页139-143。

²³ 林春虹：〈《唐宋八大家文钞》与茅坤的文统观〉，《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2，页114-118。

除此之外，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也是对自己学术思想的一次总结。茅坤在四十四岁便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从此发奋钻研古人著作。他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其实是源自于唐顺之，而他所编选的古文选本亦是受到了唐顺之文学观念的影响。

按顾尔行在卷首的题辞道：

《八大家文钞》者，行舅氏鹿门公手披而录之者也。舅氏性好读书，虽少入仕籍，而不能废书以自娱。其谪广平及官陪京，皆冷曹，无所事事，则诸家之籍咸批之，无不详且至。比不肖自既髻知诵习，尝时擘画以教焉。迨十余年来，表弟辈习为经生者日众；而时有司益重以后场风诸生，则又搜唐宋诸家，凡敷陈资于举子业者而以充广之，八公其表表者也。表弟桂，性好古，宝所习，而次为若干卷板行焉。²⁴

由是可见，《唐宋八大家文钞》未刊行之前是茅坤为其家族子弟举业而选编的刻本，并且已使用了好几年，书中的评语大多是他平日督课所讲，并由其侄子所记。茅坤开始编选唐宋文也是在他辞官后进行，按照以上题辞所言，确实与他要指导自己的儿侄举业脱离不了联系。他对于科举举业之文有自己的理解，认为举业之文同时亦承载了道学。因此，他对唐宋散文的评点也完全是从道学立场出发。也正因为茅坤并没有完全把举业看成追求功名的途径，因此，就不能单纯把编选《文钞》看成仅仅是为了服务举业的功利之举。

除此之外，茅坤亦于书前作了凡例，以补充自己编选的主旨：

²⁴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愈文钞》（合肥：黄山书社，2009），页1。

凡予所录八大家之文若干什，大都高篇然于中，亦不无工而未至者，特不诡于道，稍合作者之旨，以故辄存而不遗。

……

凡录批评，特据予所见而已，古之吕东莱、楼迂斋、谢枋得而下多不录，以其行于世已久，而学士大夫无不知之者，独近年唐荆川、王遵严二公所传，世未必知之。唐以“○”，王以“△”各标于上，以见两公之用心读书处于予所见合与否，亦不暇论。

凡八家所为论文之旨，姪桂辈尝录而出之旧矣，予览之，因令附刻于首，凡例之后，别为一卷，读是钞者，一碾卷间，其于八先生门户，大都亦可以了而觑矣。

予尝谓八君子者，不独其文艺之工，其各各行事节概，多有可观亦学者，所不可不知者，予故节录其本传，附之各集之首。²⁵

茅坤从以上数语中即明确地说明了自己选文之标准，凡尚佳的作品皆悉数收入，并把唐顺之及王慎中的评语亦收入其中，由是可见其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参照基础係以唐顺之的《文编》。他令其侄茅一桂录八大家论文之旨编排于凡例之后，又录各家本传，意在倡导学习八家之品性，对诸家为人为文的品质极为看重，足见茅氏编撰此书之匠心。

就正如他在〈八大家文钞总序〉文末所言：“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予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或于道不相戾已。谨书之，以质世之知我者”。²⁶此处他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编选意图便是要“以文明道”。

²⁵ [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愈文钞》，页 1-2。

²⁶ [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愈文钞》，页 13-14。

一、编纂体例与评点机制

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文末，他已明确言及自己的编选意图：“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予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或于道不相戾已。谨书之，以质世之知我者。”²⁷《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标举“八大家”之名，主要推从八大家之文学性作品，以拯文风。书前有〈论例〉，对八大家各有论断，举出其所擅长之文体。

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四十四卷，所录皆韩柳欧曾王以及三苏所写的古文，各家前有引说，辨其源流，评其优劣。茅坤选辑韩愈文章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欧阳修文三十二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巩文十卷，苏洵文十卷，苏轼文二十八卷，苏辙文二十卷，以作家为类别，编次诸家文章，依次编为《昌黎文钞》、《柳州文钞》、《庐陵文钞》、《临川文钞》、《南丰文钞》、《老泉文钞》、《东坡文钞》、《颖滨文钞》，以此排列八家。各钞之下有茅氏分别题写的各家钞引以及所录之各家本传。八家条目之下又再以文体排列文章，或以书记列于前，或以论著列于前，无一定律。

《唐宋八大家文钞》顾名思义即以作家为基本的编选体例，各个作家之下再以文体分类，每一作家前都有一篇引文，即对作家的总体评价。此种按作家体例所编选而成的选本，并非始于茅坤。早于茅坤之前的就有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其所选录的作家为八名，缺王安石，多了张耒，

²⁷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愈文钞》，页13-14。

其标题并不以八家名之。南宋时也有陈造所编有的《题六君子古文后》，其在文中言及“予是焉学久，未有愜于心，乃取六君子文类而读之，如昌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浑厚而古，河南之简切而古，南丰之密而古，后山之奇而古”²⁸，也选录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尹洙、曾巩及陈师道六人的文章。尔后明初尚有朱右所编《新编六先生文集》，其六先生即茅坤所指八家。唐顺之稍后编辑《文编》六十四卷，其中唐宋文章收了八家，其编选方式与标准对茅坤有着直接的影响。过后更有陆燾编成《唐宋四大家文钞》八卷，四家即指韩、柳、欧、苏。

茅坤于《唐宋八大家文钞》每家之选文前均撰一小序，以概括介绍其文特色，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及所选之文各体篇数卷数，称之为“引”。《唐宋八大家文钞》中的评点包括了“题下批”、“旁批”、“眉批”及“评论符号”。题下批，总结每篇的要旨；旁批，则是茅坤对相应语句的评语与分析；眉批，乃是对相关段落大意的论述。

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即是在参照唐顺之的《文编》之基础之上编选出来，书中更辑入唐顺之的评语，共达一百二十二条。此种大量引述唐顺之的观点来表达批评意见的做法亦足以证明茅坤对唐顺之文学思想的一种接受。他在唐顺之原有的评语之上亦作了自己的额外补充见解。针对此处，刘尊举在其〈唐宋派“师法唐宋”辨析〉一文中就指出，虽然茅坤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唐顺之的文学思想，但二者的评点的关注点却又有不同之处。²⁹唐顺之的评点主要对文章的行文风格或气势有较多的论述，

²⁸ [南宋]陈造，〈题六君子古文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文》第256册卷五七五九（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页256。

²⁹ 刘尊举，〈唐宋派“师法唐宋”辨析〉，《古代诗学的现代阐述》2011年8月，页58-59。

而这些风格的形成又大都与文章的结构布局或行文方式有密切相关。茅坤则是从整体上感受文章的风神、韵致。刘尊举更在其论文中以苏轼的〈眉州远景楼记〉一文，论及唐顺之和茅坤对此文不同的评语以证明之。

归纳茅坤书中的所有评语，大约可以将之分为四个方面，分别为结构论、叙事法、文体论和文风论。

至于全书所用的评论符号，茅坤曾于其〈八大家文钞凡例〉解说：“凡一篇本末大旨，则挈而镌之本题之下，间或于篇中抹出或——— 或 XXXX（长方形空格），其间起案或结案及文之一切紧关处亦并以抹或——— 或 XX（短长方形空格）或 L 或旁镌数字。凡文之佳处首圆圈○，次则尖圈 X，又次则旁点、，间有敝处则亦旁抹或镌数字。”³⁰由是可见，茅氏在书中一共使用八种评论符号。今存四库全书本《唐宋八大家文钞》前无〈八大家文钞凡例〉，惟明刻本存之。此“凡例”专论书中“释评”和“圈点”评论符号，四库本将其悉数删去。

以上皆是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编纂体例与评点机制的梗概。

小结

综上所述，归有光编撰《文章指南》不仅是要总结自己平时的读书心得，也是为了要授予他人，特别是当时的学子为文之法，书中所沿用的评点机制与评点符号也大多延续自宋代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一书。而此书的文章的选录主要是以唐、宋两代的作家为主，通论、立意论、结构论、

³⁰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愈文钞》，页 1-2。

引证论和修辞论来分类所选录的文章。

唐顺之作为唐宋派的中坚分子，寄望通过编选古文选本来阐述他为文必有法的文论观，《文编》便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面世。书中所引用的评点符号也与评点发展初期的宋代选本更为精细，也比归有光的《文章指南》所使用的评点符号更为多样、仔细。即便如此，也可发现唐顺之的《文编》评点依然延续了宋代的形式，诚如他喜用“某某格”来表示文章的行文风格和结构特点的方式正与宋代吕祖谦《古文关键》的品评方式类似。

至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选受到唐顺之的影响，并在此书刊行以后“八家”选本也在坊间广为接受，导致此书在后来的流传度与接受度比起归有光的《文章指南》和唐顺之的《文编》更为广泛。茅坤编选此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要让时下学子掌握为文的技巧，同时间也为了要确立唐宋古文在当时正统的地位，以便时人能清楚认识到唐宋散文的价值所在。因此不能只是单纯地把《唐宋八大家文钞》看成仅仅是为了服务举业之作。此书所使用的评点符号大体上还是与《文编》相似，由此可见，《文编》和《唐宋八大家文钞》所使用的评点符号正是当时明代普遍盛行的评点符号。

第三章：归有光《文章指南》之录韩文考辨¹

归有光于《文章指南》一文中论及韩愈文章的文法特点时，曾提及“简古”、“一本于经”，“学韩简古，不可不学他法度”，并认为写文章若只“简古而无法度，则朴而不文。”由此可见，归有光是非常看重为文之法度。他也进一步认为韩愈文章是以“简古”为主要特点，而韩文的“简古”乃有其法度可循。因之，本文拟联系《文章指南》中的编排标准，结合归有光所选录之韩愈文章与评语，分析及探讨归有光对韩文笔法的评价。最后再从归有光的文学观念以便一探其所指的为文之“法度”。

第一节 《文章指南》所录韩文辨析

总览《文章指南》仁、义、礼、智、信五集一共录二十六篇韩文，以其所选录的文章数量为最，冠诸家之首。下表为所录韩愈文章篇目分类及其占总文章数量之比率：

表 5：《文章指南》所录韩愈文章篇目分类

序号	所录韩愈文章	收录集数	体则	占总文章之比率
1	与于襄阳书	仁	占地步则则（通论）	4.55%
2	杂说一	义	譬喻则（结构论）	46.43%
3	杂说四	义	譬喻则（结构论）	

¹ 按：本文有关归有光评语的行文皆引自[明]归有光：《文章指南》（台湾：广文书局，2013）。为论述方便，此后相关引文将不赘述。

4	应科目时与人书	义	譬喻则（结构论）		
5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义	譬喻则：比体（结构论）		
6	送温处士序	义	譬喻则（结构论）		
7	进学解	义	譬喻则：兴体（结构论）		
8	重答张籍书	义	将无作有则（引证论）		
9	诤臣论	义	先抑后扬则（结构论）		
10	圻者王承福传	义	抑扬并用（结构论）		
11	与浮屠文畅序	义	扬中之抑（结构论）		
12	与孟尚书书	义	抑中之扬（结构论）		
13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义	正反翻应则（结构论）		
14	原毁	义	正反翻应则（结构论）		
15	上张仆射书	礼	句法长短错综则（修辞论）		10%
16	师说	礼	文势如击蛇则（结构论）		
17	原道	智	拦截上文则（修辞论）	30%	
18	讳辨	智	含义不露则（结构论）		
19	对禹问	智	设为问答则（结构论）		
20	送董邵南序	智	文短气长则（修辞论）		
21	送孟东野序	智	字烦不厌则（修辞论）		
22	与陈给事书	智	双关则（修辞论）	13.33%	
23	送王秀才序	信	下字影状（结构论）		
24	代张籍与李浙东书	信	立意贯说（文意论）		
25	获麟解	信	竿头进步则（结构论）		
26	送石处士序	信	结句有力则（结构论）		

从上表的分类可见，归有光在选录文章时显然并不是以文体来进行分

类，而是以文章的体则来进行分类。²归有光在谈论“结构”体则共选录了韩愈文章共八篇；谈论“修辞”共选五篇；谈论“文章本质”、“文意”及“引证”则分别选录一篇。

归有光在“通论”体则中所录的〈与于襄阳书〉，他对这篇文章总评道：“古文作文专占地步，如人要在高处立，平处坐，阔处行，如此文隐以君子之道自许是也。”在“文意论”部分只选录了一篇韩愈文章，即：〈代张籍与李浙东书〉，在其文末总评谓：“作文须寻大头脑，立得意定，然后遣辞发挥，方是气象浑成，如此篇以‘盲’字贯说。”³韩愈来作此篇以“盲”字立意贯说全文，故符合“立意贯说则”的为文之法。

“结构论”共录十八篇韩文，分别为：〈杂说一〉、〈杂说四〉、〈应科目时与人书〉、〈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送温处士序〉、〈进学解〉、〈诤臣论〉、〈圻者王承福传〉、〈与浮屠文畅序〉、〈与孟尚书书〉、〈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原毁〉、〈师说〉、〈讳辨〉、〈对禹问〉、〈送王秀才序〉、〈获麟解〉及〈送石处士序〉。

“结构论”的“譬喻则”之下共录了六篇。归有光于〈杂说一〉的总评中说道：“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以彼物引起此物也。体虽有二，而取喻之意则同。孟子文法，多本于此。故后世文章皆例用之。或不说出正意，专以彼物发挥者，如退之〈杂说〉上下篇是也。或专以彼物发

²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则收录了二十七篇韩文，其于“譬喻则”之下多选录了韩愈《送穷文》一文，广文书局本并无收录此文。

³ 黄震于其《黄氏日抄》云韩愈此文“就‘盲’字上发明，不为悲苦之辞，死中求活法也。”他进一步谓韩愈此文不仅以一字立意贯说，更运用了“死中求活法则”，见[宋]黄震：《黄氏日抄》卷59，[清]永瑢，[清]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7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472。

挥，而未含一句正意者，如退之〈应科目时与人书〉是也……或以彼物正意相半发挥者，如退之〈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或以彼物轻轻发挥，而归重正意者，如退之〈送温处士赴河阳序〉是也……或以彼物轻说，引起正意发挥者也……退之〈进学解〉，中以匠士、医师引起宰相意，正是此法，可以参看。以上属兴体。”为文时于文中设置譬喻，则可以使原本较难说明之事理变得更加简单易晓，更加形象、具体。

归有光在选文中也明确地指出韩愈所使用的譬喻之法大体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其一为不说出正意，专以彼物发挥，如〈杂说〉上下篇；其二为专以彼物发挥，末含一句正意，如〈应科目时与人书〉；其三为以彼物正意相半发挥，如〈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其四为以彼物轻轻发挥，而后归重正意，如〈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其五为以彼物轻说，引起正意发挥，如〈进学解〉。

第一种 的譬喻类型，归有光便以韩愈的〈杂说一〉和〈杂说四〉作为例子。〈杂说一〉说龙，而〈杂说四〉说马，两篇的篇幅皆短小，但寓意深远。〈杂说一〉的内容主要说龙嘘气成云，并翱翔于其中，云是龙的凭依，而龙没有云则无以神其灵。有关云与龙指向何者，历代的评论家众说纷纭，有者将其解为君臣关系，如程端礼言：“云从龙，乃贤臣遇圣主之像，此篇主意谓贤臣必得圣君而用世，圣君必任贤臣而成功”。⁴程端礼认为韩愈此篇是把云比喻为贤臣，龙比喻为圣君。也有人认为云比作臣，龙比作君，但龙和云各有本分，不能互换，如黄震云：“《龙喻》言君不可

⁴ [元]程端礼，《昌黎文式》卷上后集上卷，见《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昌黎文钞》，页532。

以为臣”。⁵

〈杂说四〉的内容主要说千里马与伯乐之间的联系，提及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而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此篇的伯乐和千里马是指何物，亦能作多方便的解读。如南宋人黄震便认为“《马喻》言世未尝无逸俗之贤”。⁶清人孙琮则认为此文“借伯乐相马隐寓世无知我”。⁷可见，此种类型的譬喻法可作多方面的解读，究竟正意为何则见仁见智，均能说得通，评者可以自由想象发挥。

第二种譬喻类型，归有光以〈应科目时与人书〉一文为例子来说明此类譬喻手法的使用。韩愈此篇为应博学宏词科试，写信给韦舍人以求引荐，行文中韩愈以“非常鳞凡介之品汇”的蛟龙为喻，说明“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陵广途绝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獫狁之笑者”。⁸他以蛟龙自喻，并在文中末句处仅以“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说焉，阁下其亦怜察之”⁹作为全文的正意。

第三种譬喻类型，归有光以〈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为例。韩愈在此文中以“蹈水火者之免求于人”为喻，分析了求救者和施援者的心态。他以蹈水火而免求于人来比喻自己，以介于其侧者来比喻宰相，然后表明自

⁵ [南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九，见《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昌黎文钞》，页532。

⁶ 同上。

⁷ [清]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韩昌黎集》卷四，见《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昌黎文钞》，页533。

⁸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1188。

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1189。

己的处境危急，使用了譬喻与正意相杂的方式书写。

第四种譬喻类型，归有光以〈送温处士赴河阳序〉为例说明。韩愈此篇序文以伯乐取马作为比喻来开篇，过后笔锋一变转而言及乌重胤罗致石生和温生事。第五种譬喻类型则以〈进学解〉为例说明。所谓以彼物轻说引起正意，是指所比喻的内容与正意并不相关。彼物与正意之间，也并非明确的譬喻关系，就如韩愈在此文内以匠氏之工与医师之良来和宰相之方作譬喻。

归有光认为“抑扬则”也有五种不同的用法，其分别选录了韩愈四篇文章来论述了其中四种“抑扬则”的用法。归有光认为〈诤臣论〉乃“先扬后抑”，于文末总评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苟非至恶，未必无一长可取。故论人者，虽不可恕人之恶，亦不可没人之善。抑而须扬，扬而须抑，放为公论。然抑扬之法，用处却不同。先抑后扬者，此论是也。”归氏以为韩愈〈圻者王承福传〉一文“抑扬并用”，而〈与浮屠文畅序〉为“扬中之抑”，〈与孟尚书书〉则为“抑中之扬”，文末总评言：“论孟子之功意与，而词不与，抑中扬也。”“正反翻应则”选录〈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及〈原毁〉，并于前者文末总评谓：“文章有正统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对。读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

至于〈师说〉这一篇则收录在“文势如击蛇则”之下。归有光认为韩愈〈师说〉此篇“救首救尾，段段有力，是谓击蛇势也”。他也将韩愈的〈讳辨〉列为“含义不露”，文末总评谓：“有一等辩论文字，全不直说，

尽是设疑。佯为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 “设为答问”之下则选录了〈对禹问〉，并于文末总评谓：“有一等文字，不直发挥，乃学孟子文法，随问而随答者，亦是一格”。 〈送王秀才序〉为“下字影状”，文末总评曰：“凡文字托事立论，其用字用意，需要与事亲切，如此序以‘醉乡记’三字，生一篇议论。首尾下字影状，细味之，方见其奇”。

最后“结法”的“竿头进步则”、“结句有力则”则个别选录了〈获麟解〉及〈送石处士序〉。归有光于“竿头进步则”云：“文章于结束处，最嫌软弱，又须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画工画画，愈出愈奇，方为妙手”；于“结句有力则”则谓：“结束虽一二句，而实有万钧之力，乃文法之绝妙者也”。“结法”的体则有八条之多，归有光仅仅选录了韩愈两篇文章以论述其中二种结法的体则。

归氏在论述“引证论”的“将无作有则”时，选录了韩愈〈重答张籍书〉一文，并于文后总评谓：“凡议论援引，固以精当为贵。然亦有牵引来说者，谓之将无作有。此善行文处，如此书后夫子之言曰数语，正得将无作有之法……退之〈送孟东野序〉云：‘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此二句，亦可与此参看。”归氏认为韩愈此篇“则其与众人辨也有矣”句正得将无作有法。他同时也指出韩愈另一篇文章〈送孟东野序〉中也有使用了将无作有法来书写。

“修辞论”中的“句法长短错综则”录了〈上张仆射书〉，认为此文“句法层叠处，必变化数样，字有多少，句有长短”。〈原道〉为“拦截上文则”，认为此文“凡句法直下来，如良马下峻岭、如轻舟下长湍，若

无一句拦截，便不成文章。此篇末尧以是传之舜云云，截以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此两句绝妙，可以为法”。

“文短气长则”选录了〈送董邵南序〉，并评论此文是“文章尖端，难得气长”，“内有许多转折，读之不觉气短”。归有光对录在“字烦不厌则”之下的〈送孟东野序〉的总评为：“文章下字重叠，未有不起人厌者，惟退之此序。凡六百二十余字，鸣字四十，似失之烦。然句法变化二十九样，愈读愈可喜，毕竟不觉。谁谓文章之妙，不在转换间乎”。“双关则”选〈与陈给事书〉一文，并以为此文“极用得巧，可以为作论之式。”

故此，从其所选录之文章及所归纳之体则，可以总结出，归有光认为韩愈文章兼具章法，即结构布势之法，与遣辞用字之法。因此他在论述“结构论”之时大量选录韩愈文章来加以说明指导。

第二节 归氏之评韩文笔法

本节尝试就《文章指南》中所选录之韩愈文章以及归有光对各篇章的评点进行论析。归有光一共在二十一篇韩愈的文章里标上评语，故此以下试就此二十一篇的韩文中有关归有光旁批进行分类处理归纳，以期整理出归有光对韩愈文章的评点特色，特兹罗列于下：

(一)〈与于襄阳书〉共有两种类型的旁批，一为主题类，一为内容类。如他在“莫不有先达之人”句旁就批曰：“上之人”；再如于“亦莫不有后进之士”句旁就批曰：“下之人”；在“愈虽不才”句旁就批曰：“下

之人”，归有光以旁批中的这几个字间接地点出了这些句子的内容大意。他又在“愈之诵此言久矣”句旁批曰：“一篇关键”，以这种方式出此篇文的主旨。

（二）〈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的旁批皆是围绕结构类来进行，如他在“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一句旁就批曰：“设喻一段却写作两层”；在“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一句旁就批曰：“入正文一段又写作两层”；在“子言则然矣”一句旁就批曰：“另起一波”；在“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与今岂异时哉”此句旁就批曰：“一段破却‘时’字”；最后在“且今节度，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此句旁就批曰：“一段即今比拟”。归有光以这种方式指出韩愈此篇文章所使用的不同书写结构，以此凸显韩愈文章的结构多样化。

（三）〈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的旁批也是以结构类为主，如他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此句旁就批曰：“一句提下一难一解”。此处的“一难一解”正是归有光在“结构论”中的“设为难解则”。按照归有光自己的说法：“凡作论辩文字，须设为问难，而以己意分解，如此非惟说理明透，而文字亦觉精神。”韩愈在此文开头先是提出伯乐经过冀北的郊野，马群便空了，过后再补上马群皆空的缘由。

（四）〈进学解〉的旁批就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主题类、结构类以及修辞类。主题类的旁批就有以下这一条，他在“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一句旁就批曰：“一篇议论张本”，以这种方式直接点出了全文的主旨。至于结构类的则有以下两条，他在“有笑于列者曰：‘先生

欺余哉！……’ ”一句旁就批曰：“以下借弟子非笑作一大开”；再于“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 ”一句旁就批曰：“以下先生自解作一大合”。修辞类的则有一条：“医师之良也”一句旁就批曰：“以匠医兴宰相”，点出韩愈在这里正是使用了比兴手法，以匠医来比喻成宰相。

（五）〈重答张籍书〉的旁批分成主题类与结构类二种类型。主题类的旁批一共有四条，分别为：“谓愈之质”一句旁批曰：“叙来书意”；他又在“抑其中有宜复者，故不可遂也”一句旁批曰：“叙答书意”；在“其为也易，则其传也不远”一句旁批曰：“昌黎本意”；最后在“好己之道胜也”一句旁批曰：“一段辩己非好胜”。归有光通过以上的旁批同样总结出韩愈这篇文章的主题。至於结构类的评点则有以下这一条：“夫子之言曰”一句旁批曰：“得将无作有法”。依照归有光在《文章指南》的〈论文章指南〉中的说法：“凡议论援引，固以精当为贵，然亦有牵引来说，谓之将无作有。”他指出韩愈此篇文章在末端引用了孔子的言论，然而孔子当时并未真正说过此话，韩愈是借孔子之言表述己见。

（六）〈诤臣论〉的旁批分为结构类和主题类二种。结构类的旁批有这一条，他在“阳子将为禄仕乎”一句批曰：“又一转”。至於主题类的旁批则是在“谏议大夫”一句旁批曰：“点出”。归有光以这种方式点出了此篇文章的全文主旨。

（七）〈圻者王承福传〉的旁批则是全以结构类为主，归有光在文中一共标出六条，如他在“粟，家而生者也”一句旁批曰：“上述其事，下述

其言”；又在“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一句旁批曰：“承上句”；又在“愈始闻而惑之”一句旁批曰：“扬”；在“然吾有讥焉”一句旁批曰：“抑”；在“而夫人以为家为劳心”一句旁批曰：“抑”；在“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一句旁批曰：“扬”。归有光不仅指出韩愈此文在结构上文意连贯一致，也指出此文运用了抑扬法。韩愈此文正使用了先扬后抑和抑扬并用的手法。

（八）〈与浮屠文畅师序〉的旁批分为主题类和结构类二种。归有光指出主题类的旁批共有四条，如他在“校其行则非，可以与之游乎”一句旁批曰：“客意”；在“校其行则是，可以与之游乎”一句旁批曰：“主意”；又在“惜其无以圣人之道告之者”一句旁批曰：“作文大旨”；最后在“宜当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一句旁批：“此句是主”。归有光简单数语即点出韩愈此篇文章的主旨所在。至於结构类的旁批则有三条，如他在“吾取以为法焉”一句旁批曰：“最占便宜”；在“夫文畅，浮屠也”一句旁批曰：“即以重一句为再提法”；最后在“流而语”一句旁批曰：“三字挽上数句”。

（九）〈与孟尚书书〉的旁批也是以结构类为主，一共有三条，如他在“非崇信其法”一句旁批曰：“一辨”；后又在“何有去圣人之道”一句旁批曰：“二辨”；最后在“进退无所据”一句旁批曰：“三辨”。

（十）〈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旁批主要以主题类为主，一共有三条，如他在“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尽章章如是”一句旁批曰：“一段就周公振势”；又在“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一句旁批曰：“以下写上书之故”；

最后在“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一句旁批曰：“前是相之道，后是相之情”。归有光也是在这里点出了韩愈书写此文的目的。

（十一）〈原毁〉旁批分为主题类及结构类二种。主题类的旁批共有九条，如他在“古之君子”一句旁批曰：“客”；又在“其责己也重以周”一句旁批曰：“客中客”；在“其待人也轻以约”一句旁批曰：“客中主”；又在“今之君子则不然”一句旁批曰：“主”；更在“其责人也详”一句旁批曰：“主中主”；在“其待己也廉”一句旁批曰：“主中客”；在“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一句旁批曰：“‘今之君子’独主一脚，折出‘原’字”；又在“怠者不能修”一句旁批曰：“客”；最后在“而忌者畏人修”一句旁批曰：“主”。归有光以这种“客”、“主”的评点方式点出了韩愈书写此篇文章的主旨确实散落之处。至於结构类的评语则有四条，如他在“其待人也轻以约”一句眉批曰：“两柱”；在“是不亦责于己重于周乎”一句旁批曰：“应”；又在“懦者必怒于色矣”一句旁批曰：“毁”；最后在“强者必说于言”一句旁批曰：“毁”。

（十二）〈上张仆射书〉的旁批也是以结构类为主，全文一共有七条评论，如他在“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一句旁批曰：“立脚处”；在“惟执事可以闻此言”一句旁批曰：“斡旋法”；在“若宽假之”一句旁批曰：“正写”；在“执事之好士也如此”一句旁批曰：“五排调贴上之使下”；在“韩愈之识其所依归也如此”一句旁批曰：“三排调贴下之事上”；又在“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一句旁批曰：“拦截上文法”；最后在“若使随行而入”一句旁批曰：“反写”。归有光在这一篇文章中指出了韩愈

使用了好几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来书写此文。

（十三）〈师说〉的旁批主要可以分成主题类、结构类和修辞类三种类型。首先，主题类的旁批共有三条，如他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开头这一句旁批曰：“一段言师之道”；在“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句旁批曰：“一段言择师之道”；最后在“圣人无常师”一句旁批曰：“借孔子作证收前圣人从师意”。以这几段文字总结了韩愈这篇文章的要点。至於结构类的评语也是共有三条，如他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一句旁批曰：“以下言世人不肯从师，双结传道、解惑有侧势”；在“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句旁批曰：“结出一篇正意”；最后在“余嘉其能学古道”一句旁批曰：“收前一‘古’字作结”。此处也是点出了韩愈此篇文章使用了不同的结构手法来书写。最后修辞类的评语则有一条，如他在“句读之不知”一句旁批曰：“双关文法”，直接点出了韩愈此句使用了双关手法。

（十四）〈原道〉的旁批分为主题类、结构类、语法类、句法类及修辞类五种。主题类的评点共有十一条之多，分别是：“合仁与义言之也”句批：“主”；第一段眉批：“自篇首至此，把吾道大旨与老子之说，相较一番，分出是非作案”；“孔子没”句眉批：“吾道不明，全在此三字”；“则入于墨”句批：“二句客”；“则入于佛”一句旁批曰：“二句主”；又在“不求其端”一句旁批曰：“始”；后又在“不讯其末”一句旁批曰：“终”；第三段眉批：“此段言援儒入老佛者之害道，上段言入彼出此，圣人之道犹存。此则把圣人都混入老佛去了，虽欲求亦无处求矣，语意尤繁”；第三段结尾处眉批：“自‘古之时’句至此，言有生民以来，全赖

圣人作用，放留得箇人种，如何以弃人伦求情景寂灭为法，比不容于三代之世。此专辟老佛之法”；第四段开首眉批：“老氏之说必行不去，求其端讯，其末如此”；第四段结尾处眉批：“自‘帝之兴王’至此，言老佛无为之法明系怪诞，不攻自破，无奈世人乐闻其说何耳，此并责为老佛之人也”。可见归有光评点此篇时用心之细。此文的结构类评语有五条：“人之好怪也”句批：“陡接”；“古之为民者六”句批：“言老佛不事，事有妨于民生以起下文”；“由周公而上”句批：“收上尧舜禹汤之行道”；“由周公而下”句批：“收上周孔孟之明道”；最后在“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一句旁批曰：“两‘易’字与怪诞对看”。在这二十一篇的选文之中，归有光对此文的评点更为用心，频频点出韩愈如何以此文层层带出全文主旨。至於语法类的旁批则有一条，如其在“博爱之谓仁”数句旁批曰：“四句是〈原道〉纲领，四句四样文法”。有关句法类的评点共有两条：“坐井而观天”句批：“衬句”；“为之君，为之师”句眉批：“叠下十七箇‘为’字，句法变换，正见圣人异于寂处无为之说”。最后与修辞类相关的旁批则有一条：“其所以为智一也”句批：“喻言用各有时”。

（十五）〈讳辨〉的旁批可分为主题类和结构类二种。主题类的批点共有三条：第一段眉批：“略分三节，第一节，律。第二节，经。第三节，国家之典”；然后在“为犯二名律乎”这一句旁批曰：“客”；最后在“为犯嫌名律乎”一句旁批曰：“主”。结构类的则有一条，见于全文末段的眉批，归有光评曰：“总收三段”。

（十六）〈送董邵南序〉的旁批可分为主题类和结构类二种。主题类有

一条，如他在“吾因之有所感矣”一句旁批曰：“余意”。结构类的则有两
条，分别如下：“夫以子之不遇时”一句旁批曰：“转”；又在“然吾
尝闻风俗与化移易”一句旁批曰：“又转”。

（十七）〈送孟东野序〉的旁批以结构类为主，只有一条，见于文中第
四段的眉批曰：“二段作文主意”。

（十八）〈与陈给事书〉的旁批也是以结构类为主，全文一共有三条，
如他一开始在“去年春，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一句旁批曰：“重起二扇，
此扇轻”；后又在“其后，如东京取妻子”一句旁批曰：“此扇重，再叙
不相见”；最后在“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一句旁批曰：“以‘见’字
作骨子”。

（十九）〈送王秀才序〉的旁批主要以主题类为主，共有两条：“若颜
氏子操瓢与箪”句批：“又推上一层最占地步”；又于文中第一段眉批曰：
“美其先世忠义，悲其不遇圣人”。

（二十）〈代张籍与李浙东书〉的旁批主要以结构类为主，共有三条，
如他在“赐之以既盲之视”一句旁批曰：“结处又透过一层”；又在“阁
下能信而致之于门耶”一句旁批曰：“反诘一句”；最后在“夫盲者业专，
于艺必精”一句旁批曰：“束进一步”。归有光也是点出此文使用了不同
的结构书写手法。

（二十一）〈获麟解〉的旁批以结构类为主，共有六条，分别是：“然
麟之为物”句批：“第二转”；在“角者吾知其为牛”一句旁批曰：“第

三转”；又在“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一句旁批：“第四转”；在“虽然，麟之出”一句旁批曰：“第五转”；在“麟之所以为麟者”一句旁批曰：“第六转”；最后在“若麟之出，不待圣人”一句旁批曰：“第七转”。归有光点出韩愈此篇文章的叙述手法共有七层转换。

从以上各篇章的旁批中可以见得，归有光在《文章指南》中，评论韩愈文章之时，多侧重点评韩愈为文的结构之法。

首先，他以为韩愈的文章专以“新奇”为主，如其评〈上张仆射书〉曰：“韩公作文，专以新奇为善。故于句法层叠处，必变化数样，字有多少，句有长短，读之尤觉有起伏、有顿挫、有波澜。”再如，其评〈送孟东野序〉云“句法变化二十九样，愈读愈可喜”。归氏总结出韩愈为文句法多变，让人读之倍感新奇。韩愈文法多变，具有“新奇”特点，这观点非归有光首发之，在宋代之时便有人如此指出，按〈庄、骚、太史所录〉一文所言“文体之工，自文法之变始，愈变而愈工……文之正者无奇，无奇则难工”。¹⁰方澄孙此处的说法与归有光的不谋而合，正因为韩愈文法多变，其文则能新奇。

此外，归氏认为韩愈为文善用“双关文法”，如其在〈与陈给事书〉评道：“双关文法，诸家惟韩文喜用……退之〈诤臣论〉若蛊之上九云云、〈师说〉句读之不知云云，亦可参看。”其实针对韩愈喜用双关文法，归有光并非首发其论，在此之前已有南宋的谢枋得对韩愈喜用双关文法，在

¹⁰ [宋]方澄孙，〈庄、骚、太史所录〉，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文》第350册卷八〇九三（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页107-110。

他评点韩愈的〈诤臣论〉时就有这么一段说法：“一段六句是双关文法，韩文公专喜用之，可以为法”。¹¹除了此篇，归有光更点出韩愈亦在其他文章中频频使用“双关文法”。

归有光在评价韩愈笔法时，亦认为其乃学孟子之文法。如其在“设为问答则”，选录了韩愈《对禹问》并评曰：“有一等文字，不直发挥，乃学孟子文法，随问而随答者”。在“譬喻则”中，归有光在此则所录韩文之下评曰：“孟子文法，多本于此”。

在归氏之前，已有不少文学批评家论及韩愈学孟子笔法，如《文章精义》就曾言及：“韩退之文学孟子”。¹²泛泛数字，只提出韩愈之学孟子，却无实际文章例子。《容斋三笔·韩苏文章譬喻》谓：“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¹³洪迈则仅仅点出韩愈喜用譬喻。归氏通过评选韩愈文章，提出韩愈之学孟子，在于其为文能“随问随答”，“不直发挥”，并大量使用“譬喻”手法。

归有光曾在〈五岳山人前集序〉中评韩愈“才兼众体，故叙樊绍述，则如樊绍述；叙柳子厚，则如柳子厚”。¹⁴韩愈为文不局限于一种体则，而是多种体则并用。虽然归有光在选录韩愈文章时，将其分类于一体则之下，在评论时往往会点出此文章所使用的其他体则，好让读者能互相参见。如在〈师说〉一文“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句旁批：“双关文法”，再如〈上张仆射书〉一文“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句旁

¹¹ [南宋] 谢枋得：《文章轨范》，台北：广文书局，1970，页 65。

¹² [宋] 李涂，刘明晖校点，《文章精义》（香港：中华书局，1977），页 61。

¹³ [宋] 洪迈，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 501。

¹⁴ [明] 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页 27。

批：“拦截上文法”。由此可见，韩愈文章体则风格多变，归有光深以为作文当如此。

第三节 归有光的为文之法

有关归有光的为文叙事手法及其散文特色，已有不少学者讨论之，兹不累述。¹⁵本节仅从归有光编选《文章指南》的选录标准中所能展示的为文之“法”，即其文学观点作辨析。归有光本身不但善于写文，更有一套系统化的文学理论。若要论及归有光的为文之法，便要先谈论他的文学观点。

“文”与“道”本是历代文论中最为关键的一项，自从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所发起的唐代古文运动提出了“文以明道”的理论，二者的关系变成了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韩愈最早在〈争臣论〉一文中首次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¹⁶韩愈此处是指君子在朝廷当官，就一定要竭尽心力为朝廷效力；若是没有当官就应当用文章来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因此，“修其辞以明其道”便是“以文明道”。而韩愈所指的“道”是儒家之道，他自己也曾明言“愈之志在古道，又好其言辞”（〈答陈生书〉）。¹⁷这就说明了韩愈看重儒

¹⁵ 关于归有光散文笔法及叙事手法的研究，学界多有论述，可参见吕新昌：《归震川及其散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沈新林：《归有光评传·年谱》（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贝京：《归有光研究》（北京：商务出版社，2008）。

¹⁶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1170。

¹⁷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1529。

家之道的同时也重视文章的遣词造句，秉持着文道并重的观点，“文”和“道”乃是一体的。

至于归有光本身的文道观点，首先对于“文”的本质，他曾在〈雍里先生文集序〉中如此说道：

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为文，其言适与道称，谓之曰：“其旨远，其辞文，曲而中，肆而隐”。是虽累千万言，皆非所谓出乎形，而多方骈枝于五脏之情者也……虽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夫道胜，则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胜，则文不期多而自多。溢于文，非道之赘哉！¹⁸

此外，归有光又在〈项思尧文集序〉中言：

文章，天地之元气，得之者，其气直与天地同流，虽彼其权足以荣辱毁誉其人，而不能以与于吾文章之事。而为文者，亦不能自制其荣辱毁誉之权于己，两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¹⁹

他认为“文”的本质是“道之所形”，也是“天地之元气”。所谓“道”即是文章的内容，“言”则是文章的形式。在为文，即文章内容方面，他特别强调“道”与“气”二者的重要性，所谓“道”即是六经之言，圣贤尧舜之道。归有光在其〈论文章体则〉开宗明义即说“义理”、“养气”、“才识”、“关世教”及“占地步”是为文的通用体则，亦是文章的本旨与功能。归有光这种对“文”和“道”的观点与韩愈的文道观有着

¹⁸ [明] 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页 26。

¹⁹ [明] 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页 21。

许多相似的地方。虽然他的“文者，道之所行也”是对韩愈文道并重观念的继承，但是二者之间依然还是存在着些许不同。韩愈的“道”更多是注重宣扬儒家的道统，在他看来，为文便是为了要宣扬儒家道统，文是一种宣传手法。而归有光则是更侧重于文，并无过多强调文章要“明道”，只是更明确地指出文章该以何内容为主方为佳作。

此外，归有光也有指出“文章以理为主，理得而词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为文必在养气，气充乎中而文溢乎外，盖有不自知者……文章非识不足以厚其本，非才不足以利其用。才识具备，文字自会高……文章不足关世教，虽工无益也……古人作文专占地步，如人要在高处立，要在平处坐，要在阔处行。”按照归有光的概念，文章的本旨当以“义理”、“养气”、“才识”、“关系世教”以及“占地步”为主。归有光的“养气说”也是受到韩愈“文气说”的影响。

韩愈的养气说更多是在强调作家的内在道德修养。归有光也是非常重视文章之“气”，进而有了“为文必在养气”一说。他认为只要作家注重自身的内在修养，气充于肺腑之间，即能写出一篇好的文章，文辞、情感也会自然洋溢于文章之中。故此，其在论述韩愈文章之时，亦以“气”论之。例如在其修辞论内有一条“文短气长则”就选评了〈送董邵南序〉，以为此文“气长”，“读之不觉气短”。

归有光论事善于以片言居要，警策全篇。陆机《文赋》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难（按：此处应为误字，参考书中的集注部分，

正确应为‘虽’字)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²⁰归有光在评点韩愈文章时,亦不时点出该篇文章的警策之句。在〈进学解〉“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句旁批曰:“一篇议论张本”;在〈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句旁批曰:“结出一篇正意”;在〈与陈给事书〉“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句旁批曰:“以‘见’字作骨子”。

文论家亦非常重视遣辞造句之问题,认为“字句亦为文家一大事”,字句如若不通顺、不完美,则无法将文章的要义圆满表达出来。《文心雕龙·练字》曾言:“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²¹此已道出用字之难,然而为文除了立意相题,也当于字法、句法与篇法下功夫。故此,有关字法、句法与篇法的体则占了归有光《文章体则》的大部分。六十六条体则中其中二十六条为论述篇法;八条专谈字法与句法;至于谈论文章气势则有六条,谈论文章结法则有八条。

唐代杜牧曾曰:“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²²明代黄子肃又道:“大凡作诗,须立意。意者,一身之主也。”²³故此,历代文论家无不以为,为文写诗要于立意,即确立主题思想的问题。创作须先立意,再而根据意来遣辞用字,才能使文章一脉相承。归有光的“六十六条体则”共有十三条归属于“文意论”,亦足以证明归氏对文意的重视仅次

²⁰ [三国]陆机,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页145。

²¹ [南朝梁]刘勰着,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1467。

²² [唐]杜牧,吴在庆校注,〈答庄充书〉,《杜牧集系年校注》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884。

²³ [明]黄子肃,《诗法》,[清]顾龙振编辑,《诗学指南》卷一(台湾:广文书局,1970),页16。

于篇法。

此外，归有光为文大量使用譬喻修辞手法。无独有偶，归有光对韩愈学孟子笔法的评价，也正是以为韩愈擅用譬喻手法，深得孟子笔法。李璠在其《中国文学概论》中言及：“归氏（归有光）文章从韩欧入，而从史记出。其散文简洁朴质，似平易而实丰腴，擅长家庭琐事之记述，亲切感人。情韵兼至，涉笔成趣，独树一帜。钱谦益推之为明文之首，清代清桐城文派，奉为远祖，而师其义法。”²⁴

此外，《文章指南》每篇选文文末，其批点方式亦与《史记》的结尾“太史公曰”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归有光的散文也常用“论赞”，如其在〈项脊轩志〉中即有一段“论赞”：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
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
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
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²⁵

归有光其他作品，多数皆附上论赞于文末，这足以说明归氏在文章结尾处使用“论赞”已然成为其一种思维定势。在其评阅文章时亦复如是。

与此同时，归有光在〈送陆嗣孙之任武康序〉一文中认为为文亦崇尚“简古”、“古雅”，“文章一去吴中靡丽之习，要归于古雅，”²⁶又如

²⁴ 李璠，《中国文学概论》上册（台湾：国立空中大学，1989），页338。

²⁵ [明]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页430。

²⁶ [明]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页237。

归有光曾在〈山斋先生文集序〉一文中言道：“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后能知学古。故上焉者能识性命之情，其次亦能达于治乱之迹，以通当世之故，而可以施于为政。”²⁷钱谦益在〈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中称许归有光，认为他“立法简严，一禀于古。移步换形，尺水兴波，直追昌黎，不问其余也。”²⁸明代后七子的代表人物之一王世贞也曾于〈归太仆赞并序〉一文中如此评价归有光道：“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²⁹钱谦益和王世贞皆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归有光的散文与韩愈散文二者之间的关系。至於归有光本人亦曾在〈与沈敬甫〉这篇文章中自云：“世无韩、欧二公，当从何处言之”。³⁰由此可见他亦认同自己是以韩愈文章为最高目标。

正是因为归有光的文道观是对韩愈“文以明道”的继承与阐述，再加上他提倡为文崇尚自然质朴，反对雕琢藻饰，这一论点也与唐顺之所提出的“本色论”相似。虽然归有光与王慎中、唐顺之和茅坤等人并无直接的往来，写作的内容与艺术风格也跟其他诸子不同，但亦可将之归属于唐宋派之下。黄毅曾指出：“从归有光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影响考虑，也可以把归有光属于唐宋派，但把他视为唐宋派的同盟者似乎更合适”。³¹黄毅更将归有光视为唐宋派的“异类”。何梓庆在其博士论文《明代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第二章第一节中就提出归有光虽然与王慎中、唐顺之和茅坤不

²⁷ [明] 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页 25。

²⁸ [明] 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页 8。

²⁹ [明] 王世贞，陈书录选注，《王世贞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页 280-281。

³⁰ [明] 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页 867。

³¹ 黄毅，《明代唐宋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 25。

相往来，但他与这三人一样，都是推崇唐宋文，因此被归入唐宋派一员实乃当之无愧。³²

吕新昌总结归有光散文的特色，谓其散文内容言之有物，散文形式言之有序，论文篇章结构安排有效，字句锻炼技巧多变。³³吕湘瑜亦认为归有光论作文以“理”为主，必须“关世教”，其次为文必在养气，也需推及才学识。³⁴归有光的散文皆与其文学理论一一相呼应。

《文章指南》六十六条体则中，论述写作手法、修辞格式占据全书的主要篇幅，而其中所录韩愈之文章皆归于结构布势体则、修辞格式体则之下，不难看出归有光认为韩愈散文的精粹尽在于为文多变、多体并用，善用修辞手法。因此，诸家之中惟录韩文之最，归有光以为韩愈文章正能与他为文的理念相符。而归有光本人的散文写作亦多得益自韩愈，然而他不泥于古人，形成自己独有的文章风格。虽然归有光在《文章指南》的评语及条则中不时出现“场中”、“举业”、“起手”、“承题”、“腹讲”等八股文字眼，考其初衷乃为举业而作，然在选文上皆以古文为主，恰好与其以古文为时文的思想不啻而合。

虽然归有光的影响力在当时远远不及唐顺之和茅坤等人，乃至他所编选的这部《文章指南》也远不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却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王世贞不仅把归有

³² 何氏也在论文中从归有光的科举习性、归与三人在时文场域中的不同占位来论述归有光不与三人往来的原因，见何梓庆，《明代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香港：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页18-41。

³³ 吕新昌，《归震川及其散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页187-200。

³⁴ 吕湘瑜，《宋明清古文选本述略——典范形成的历程》（《辅大中研所学刊》2007年第十七期），页248-249。

光标榜为古文“名家”，更在〈归太仆赞并序〉中认为“千载有公，继韩、欧阳”。³⁵由此可见，王世贞把归有光看成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把他比作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王世贞对归有光的高度赞誉，使归有光在明末清初的拥有巩固的地位，并成为了清代桐城派人物眼中的典范。

小结

归有光所指出的韩愈文章之“法度”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为文之法。对归有光而言，“文”是“道之所形”，而“道”便是文章的内容。他特别强调文章“道”和“气”的重要性。他这种对“文”和“道”观念正是继承了韩愈文道并重的文学观念。但是二者之间依然存有不同之处，韩愈所指向的“道”是儒家的道统，而归有光指向的“道”更多是回归到文章内容本身。

此外，他也对“气”极为看重，并提出了“养气”之说，其实这也是受到韩愈“文气说”的影响。二者都是指向作者内在的道德修养。为此他常以“气”来评点韩愈的文章。

归有光在评论和总结韩愈文章特色多侧重于点评韩愈文章的结构章法，并提出了韩愈文章具有新奇的特征。韩愈文章“新奇”之处具体体现在文章句法的多样化和多变动，不拘于一种体则而已。他也进一步指出韩

³⁵ [明]王世贞，陈书录选注，《王世贞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页280-281。

愈文章的特点在于擅长使用双关文法，而归有光这种观点其实也并非他个人独创，实际上是延续了南宋以来文论家对韩愈文章的评价。

除此之外，他也点出韩愈文章与孟子文法之渊源，而这种对韩文的评价同样也非归有光的创见，也是延续了宋代以来文论家对韩愈学孟子笔法的观点。只是归有光在这一基础之上，使用韩愈文章作为实际例子标出韩愈文章与孟子文法二者的相似之处。

然而《文章指南》此书自刊行以来，流通与接受度远没有其他选本来得广泛，而归有光的影响力在当时也远不及唐宋派其他诸子来得高，一直到明末后七子王世贞的大力推崇，才使得归有光在明、清之际享有极高的声誉。

第四章：唐顺之《文编》之录韩文考辨¹

唐顺之为明代八股文之大家，诚如《明史·文苑传》卷二百八十七道：“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者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明泉。”²写作八股文讲求起承转合、绳墨布置，是以唐顺之在论文时也偏重于文章的结构。为了阐发他为文的文法理论，更编选了《文编》。是故，本章将从唐顺之编选的《文编》中所选录韩愈的文章，以窥探唐氏的文论观及其对韩文的评析，兼论唐顺之所谓为文之“法”当指向何物。

第一节 《文编》之录韩文辨析

唐顺之在《文编》中一共录选了文一千四百二十首，按所收录的文体来分类，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类，分别为奏议类、议论类、应用类和记叙类。这四类文体又可再细分如下，奏议类，包括谏疏、论疏、表、奏、上书、劄子、状等；议论类，包括论、断、议、策、杂著等；应用类，包括辞命、书、启、序等；记叙类，包括记、碑、铭、传、行状、祭文、墓志铭等。

奏议类的文章中，除了表、劄子、状这三种文体以外，主要收录了先秦和两汉的文章；至于表、劄子、状这种散文体所收录的则是以唐宋的文章为主。议论类文章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先秦诸子散文，一部

¹ 按：本文有关唐顺之评语的行文皆引自[明]唐顺之：《文编》（明嘉靖间福州知府胡帛校刊本）。为论述方便，此后相关引文将不赘述。

² [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7384。

分是从前朝史书中截取出来的散文篇章，还有一部分是唐宋八家的散文。

应用类文章，如：书、启散文，则是以唐宋八家的作品为主，其中又以韩、柳为最。序文主要包括三小类，分别是政教序、诗文序和赠送序。最后记叙类散文中的神道碑、墓志铭及其它记人的文章中，以韩愈、欧阳修两人所收录的篇章为多。从整体上来看，唐顺之最为推崇的唐宋古文家依序为韩愈、欧阳修和苏轼三人。

因此，全书选录了韩愈文章共一百六十三首。《文编》中所选录的韩愈文体计有：“疏议”二首、“表”一首、“状”三首（分为等状及下状二类）、“论”三首、“议”二首、“杂著”十五首、“杂著辩”四篇、“书”三十八首、“启”三篇、“序”三十一首、“记”四首、“神道碑”六首、“碑铭”九首、“墓志铭”二十四首、“墓表、传”五首、“行状、祭文”十三首。

以下为所选录韩愈文章之篇目分类一览表：

表 6：《文编》所录韩愈文章篇目分类

文体	所录之韩文	占同类选文比率
疏议	〈禘祫议〉、〈复讎议〉（卷七）	16.67%
表	〈论佛骨表〉（卷九）	1.92%
状：等状	〈论变盐法事宜状〉（卷十八）	9.09%
状：下状	〈论淮西事宜状〉、〈黄家贼事宜状〉（卷十九）	18.18%
论	〈本政〉（卷二十七）、〈争臣论〉（卷三十）、〈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卷三十二）	1.18%
议	〈改葬服议〉、〈省试学生代斋郎议〉（卷三十六）	25%

杂著	〈进学解〉、〈获麟解〉、〈送穷文〉、〈伯夷颂〉、〈子产不毁乡校颂〉（卷三十七）、〈原道〉、〈原性〉、〈原毁〉、〈原鬼〉、〈原人〉、〈师说〉、〈杂说〉、〈守戒〉、〈释言〉、〈对禹问〉（卷三十八）	28.3%
杂著辩	〈讳辩〉、〈读仪礼〉、〈读墨子〉、〈读荀子〉（卷三十九）	8.7%
书	〈上张仆射书〉、〈与鄂州柳中丞书〉、〈又与鄂州柳中丞书〉、〈答陈生书〉、〈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答元侍御书〉、〈与孟简书〉、〈上张仆射论击毬书〉（卷四十七）、〈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上兵部李侍郎书〉、〈答李翊书〉、〈重答李翊书〉、〈答陈商书〉、〈答刘正夫书〉、〈答窦秀才书〉、〈答尉迟生书〉（卷四十八）、〈上宰相书〉、〈后十九日上书〉、〈上宰相第三书〉、〈应科目时与人书〉、〈与于襄阳书〉、〈与凤翔刑部尚书书〉、〈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卷四十九）、〈与陆员外书〉、〈与崔群书〉、〈答崔立之书〉、〈上考功崔虞部书〉、〈与陈给事书〉、〈与袁相公书〉、〈为人求荐书〉、〈答吕医山人书〉、〈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与孟东野书〉、〈与李翱书〉、〈答冯宿书〉、〈答卫中行书〉、〈答侯继书〉（卷五十）	27.74%
启状	〈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为分司郎官上郑尚书相公启〉、〈贺徐州张仆射白兔状〉（卷五十一）	13.04%
序	〈张中丞传后序〉（卷五十二）、〈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荆潭唱和诗序〉、〈石鼎联句诗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卷五十三）、〈送王秀才序〉、〈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杨少尹序〉、〈送齐暉下第序〉、〈送高闲上人序〉、〈送文畅序〉、〈送廖道士序〉、〈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送郑尚书权序〉、〈送郑十校理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杨支使序〉、〈送许郢州序〉、〈赠崔复州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石处士序〉、〈送殷员外序〉、〈送湖南李正字序〉、〈送窦从事序〉、〈赠张童子序〉、〈送王秀才序〉、〈送牛堪序〉、	28.19%

	〈送陈秀才彤序〉、〈送孟秀才序〉、〈送何坚序〉（卷五十四）	
记	〈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蓝田县丞厅壁记〉（卷五十五）、〈燕喜亭记〉（卷五十六）、〈画记〉（卷五十七）	3.85%
神道碑	〈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唐故相权公墓碑〉、〈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唐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上柱国襄阳郡王平阳路公神道碑铭〉、〈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卷五十八）	42.86%
碑铭	〈南海神庙碑〉、〈处州孔子庙碑〉、〈衢州徐偃王庙碑〉、〈黄陵庙碑〉、〈平淮西碑并序〉、〈柳州罗池庙碑〉、〈袁氏先庙碑〉、〈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曹成王碑〉（卷五十九）	22.22%
墓志铭	〈故江南西道观察使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铭〉、〈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志铭〉、〈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孔左丞墓志铭〉、〈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唐故国子司业竇公墓志铭〉、〈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王评事墓志铭〉、〈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张给事墓志铭〉、〈孔司勋墓志铭〉、〈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襄阳卢丞墓志铭〉、〈故具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卷六十）、〈贞曜先生墓志铭〉、〈施先生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李元宾墓志铭〉、〈马少监墓志铭〉（卷六十二）	31.58%
墓表、传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何蕃传〉、〈圻者王承福传〉、〈毛颖传〉（卷六十三）	17.86%

行状、祭文	〈赠太傅董公行状〉、〈潮州祭神文五首〉、〈祭裴太常文〉、〈祭柳子厚文〉、〈祭马仆射文〉、〈祭张给事文〉、〈祭穆员外文〉、〈祭郴州李使君文〉、〈祭虞部张员外文〉、〈祭侯主簿文〉、〈祭郑夫人文〉、〈祭十二郎文〉、〈独孤申叔哀辞〉（卷六十四）	28.89%
-------	--	--------

按其所选录的篇章在该文体中所占的比率观之，依序为“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祭文”、“杂著”、“序”及“书”类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唐顺之以为最能体现韩愈文法及其古文造诣的正是“书”、“序”、“墓志铭”、“杂著”及“行状、祭文”类文章，故选入的数量较多。

其实早在南宋之时，吕祖谦《古文关键》在评选韩愈文章之时已大量选录韩愈“书”、“序”两类文体为主，此后的《崇古文诀》也多录韩愈的墓志铭类文章。来到明代，不管是归有光、唐顺之或是茅坤皆都认为最能表现韩愈本色的文类正是“书”、“序”、“墓志铭、碑志”类的文章。由是可见，历代的文论家皆认为此类文体正是韩愈的独创，也是最能展现其文章特点。故而，也收录此类文章的数量占最多。唐顺之在选录文章时，韩愈大多的典范之作皆有收录在其中。

由于唐顺之编选《文编》是以文体来分类，故不能似归有光的《文章指南》般能明显看出其选文之倾向，只能结合唐顺之的评点来窥探其对韩文的接受。下节将就唐顺之对韩愈文章的评点作一探讨。

第二节 唐顺之之评韩文笔法

纵观唐顺之所评析的韩愈文章，可以发现他在评点韩愈文章之时多从文章结构以及文法下手，并且针对韩愈不同类型的文章，亦个别点出其特点。唐顺之在评论韩愈疏议体文章的特点为“平正妥帖”，此评语可见其于〈褫袷议〉一文的首批。

唐顺之于文章的首批中常用“某某格”一词亦多出现在韩愈“序”体的文章中。他共选录了韩愈三十篇序文，并将这三十篇的序文分类成十四种不同的“文格”，分别为“立题格”、“借客格”、“古今格”、“反题格”、“贯珠格”、“叙事格”、“分段格”、“相形格”、“牵和格”、“抑扬格”、“尚奇格”、“脱空格”、“闲说格”、“辨证格”。他更以此总结说明韩愈的“序”体文章，“文格”多变，不拘于一“格”。诚如他在〈张中丞传后序〉题下批：“辨证格”，在〈送王秀才序〉、〈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批：“立题格”，在〈送杨少尹序〉批：“借客格”，〈送齐皞下第序〉批：“古今格”，〈送文畅序〉批：“反题格”，〈送廖道士序〉批：“贯珠格”，〈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送郑尚书权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石处士序〉批：“叙事格”，〈送郑十校理序〉批：“分段格”，〈送杨支使序〉批：“相形格”，〈送许郢州序〉批：“牵合格”，〈赠张童子序〉批：“抑扬格”，〈送王秀才序〉批：“尚奇格”，〈送牛堪序〉批：“闲说格”以及〈送陈秀才彤序〉批：“脱空格”。唐顺之不仅看重古文的结构，同时也认为行文应当错综多变，富有变化。

除了在“序”体类中出现以“文格”来评论韩文，他亦在其他文体中以同样形式作评论，如其在〈蓝田县丞厅壁记〉和〈燕喜亭记〉两篇记文中也批道：“叙事格”。由此可见，唐顺之认为韩愈文章，特别是“序”体类，主要是以“叙事”为主。

唐顺之进一步在评点韩愈的“序”文时，指出“奇”是其“序”文之特点，如他在〈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此一段“若筑河堤以障屋溜，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句子旁批曰：“奇语”，又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一文此“今浮屠者，孰为而孰传之邪”句子旁批曰：“奇思”，又在〈送杨少尹序〉一文首批曰：“叙得奇”，又在〈送齐皞下第序〉这一段句子“是知齐生后日诚良有司也，能复古者也，公无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旁批曰：“结得奇”，也又〈送王秀才序〉一文的首批中曰：“立意奇，尚奇格”，又在〈送高闲上人序〉一文的尾批曰：“奇妙”。他也在〈送牛堪序〉一文中的尾批曰：“此篇文字意格异常”，后又于〈送何坚序〉一文的尾批中亦说道：“此篇在短文中尚为奇作”。唐顺之一共在以上这七篇韩愈的序文中都以“奇”字作为评语。若说唐顺之选录文章的标准是要载道宗经，如果在这基础之上又能具有非同寻常的“奇思”，更是他所青睐的。

除了以上七篇韩愈序文，唐顺之也在〈送孟东野序〉这一篇序文的夹批中曰：“以下只是叙历代之善作文者，而立论乃尔奇，则笔力固不可到也”。其实韩愈书写此文时乃是从创作心理出发，揭露了历代文人的创作实际上皆是“不平则鸣”，而唐顺之认为此篇之“奇”就在于作者的观点

独到而且新颖。

除了在“序”类中以“奇”字作为主要评语，韩文“奇”亦散见在其他篇章，如评〈讳辩〉曰：“奇绝之文”，再如〈处州孔子庙碑〉批曰：“奇”，又如〈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尾批：“奇语”。由是可见，唐氏深以为韩愈不仅在“序”文以“奇”取胜，在其他的文体中亦复如是，“奇”应当是韩愈散文最大的特色，源于其文立意之巧思妙想。

对于文章布局结构，唐顺之尤为讲究的就是文章起承转合之变化，以及前后脉络的照应，如他在〈送杨少尹序〉中评曰：“前后照应，而错综变化不可言”。韩愈此序是为了赠别国子司业杨巨源所作，全篇以西汉疏广、疏受功成身退作对比，以此衬托杨巨源不贪图名利、功成身退的贤明睿智，通篇以古今人事交错叙述，避免平铺直叙的写法。又如〈送孟东野序〉一文中，他在文章开篇评曰：“此段文字错综”。韩愈在〈送孟东野序〉的开篇以物、言交错叙述，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若遭遇外力触动，必定有所激发，进而揭示了“不平则鸣”的道理。由是可见，唐顺之十分欣赏此种由两条线索交替并行的叙事方式。

与此同时，唐顺之评论韩愈文章，不仅讲究错综为文，亦要求需抑扬结合，以此形成文章波澜起伏之势。诚如他在〈答李翊书〉中总评曰：“此文当看抑扬转换处”，韩愈通过此文阐述了他的文学观，唐顺之认为此文正体现了作者对后学循循善诱和用心良苦，也正是造就此文动人之处。

至于唐顺之认为最能体现韩愈文法及造诣的“书”类体，不仅只看重其结构文法，亦兼分析此类文体的内容形式。唐顺之认为韩愈的“书”体

文章多是表达四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探讨为文之法，如〈答李翊书〉、〈答陈商书〉、〈答刘正夫书〉，唐顺之皆首批曰：“论文”。其二是“求”，唐顺之于〈后十九日复上书〉批：“求情”，〈应科目时与人书〉批：“求荐”，〈与于襄阳书〉批：“求通”，〈与凤翔刑部尚书书〉批：“请见”，〈与袁相公书〉批：“荐人”。这些文章皆是韩愈向位居高位的忠臣，或是举荐自己或有才之士，冀望得到提拔，或是希望得以融洽共处。其三是“叙”，唐顺之在〈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批：“叙情”，〈答崔立之书〉、〈与李翱书〉、〈上兵部李侍郎书〉、〈答侯继书〉批：“自叙”，〈答吕医山人书〉批：“自明”。以上文章的内容皆是作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满腔悲愤。其四为酬赠答谢之作，如其在〈答窦秀才书〉批：“酬答”。

唐顺之认为韩愈“书”类体文章的特点是“直”，如他在〈与袁相公书〉、〈答吕医山人书〉、〈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与孟东野书〉、〈与李翱书〉首批：“直”。唐顺之所谓“直”系有两层含义，一指文章连贯畅通，二指直书胸臆。前者意谓没有波澜起伏、顿挫曲折，属于此类的文章中，唐氏亦较少使用表示转换的批点符号。后者则意谓作者直接于文中表露心声，表明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他也指出韩的书体文章具有“累累如珠”的特点，可以见其在〈答李翊书〉一文的尾批中如此指出：“累累然如贯珠，其此文之谓乎。”所谓“贯珠”亦是指向文章前后照应，脉络严谨。

至于韩愈“墓志铭”体的文章，唐顺之品评的关注点仍是论述其叙述手法。姜云鹏在其论著中便指出唐顺之评点韩愈“墓志铭”类的文章以叙

述手法为主，正说明了唐氏《文编》受到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的影响。³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将各文体的作用划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种，而墓志铭、墓碑则被划分在“叙事”类文体之下。因此，唐顺之在评点韩愈“墓志铭”文类时反而重视他的叙述方式。诚如唐顺之在〈唐故相权公墓志铭〉首批曰：“平叙多用叙说”。他在〈曹成王碑〉文首批：“直叙”。此处所谓“平叙”和“直叙”即系按人物生平或事件发展过程来顺叙。

他也在〈赠太尉许国公道碑铭〉文中“后汴之南则蔡，北则郟，二公患公据间为己……”句旁，批曰：“抽”。意思便是按照此文事件发展的叙述，此段文字当在前叙诛杀吴元济和李师道之间，作者现将其抽出放于后段叙述。在〈曹成王碑〉“绍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忧，王奉母太妃逃祸民伍，得间走蜀从天子……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句旁，批曰：“追”。此文先述李皋与母逃亡，后又追叙他十岁丧父的事情。李皋十七八岁继承封号，三年后遇兵乱始伴母逃亡。由是观之，“抽”和“追”乃是指插叙手法。

除了顺叙和插叙，唐书之亦指出韩愈的“墓志铭”文使用了“倒叙”手法，如其在〈故江南西道观察使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铭〉首批：“倒格”，后又尾批曰：“此篇叙事不依次序，乃倒转说”。“倒格”和“倒转说”正是指“倒叙”。

世谓韩愈笔法皆习古，唐顺之在“墓志铭”体的文章中明确指出韩愈

³ 姜云鹏：《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页 76。

所学习与借鉴的对象。如〈曹成王碑〉首批：“直叙。太史公文。叙事处亦暗仿太史公”。又如其在〈柳子厚墓志铭〉“使子厚在台省时”句旁批：“此格自〈伯夷传〉来”。〈赠太傅董公行传〉首批：“此文叙事全是学左氏”。唐顺之借此说明韩愈将《史记》和《左传》的史家笔法用于书写墓志铭文章之中。然而，唐氏认为韩愈虽学古人，亦会求变求新，自成一格。唐顺之在〈襄阳卢丞墓志铭〉一文的尾批中指出此文的特色是“变。一篇俱是求文者自言，更不书一事”。他也在〈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君墓志铭〉一文的首批曰：“详叙世次，亦一格”。后又于〈孔司勋墓志铭〉一文的首批曰：“通篇只叙诤卢从史一事”。同样的也在〈柳子厚墓志铭〉一文尾批曰：“文变”。最后他也在〈李元宾墓志铭〉一文的尾批中如此指出：“此亦变体，李观本文士，而又为韩公之友，不知发之，何以如此，其格也。”唐氏通过以上诸篇的评语指出韩愈的墓志铭文章不仅能采取学习古人笔法，而又能从中求变，自成一家。

与此同时，唐顺之也在韩愈的“墓志铭”文章中说明其对宋代欧阳修和王安石等人的墓志铭文章笔法之影响。〈唐故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首批：“前叙历官，后叙事行，欧公、荆公多用此体”。〈贞曜先生墓志铭〉首批：“序一事”并于“端序则见”句旁批言：“奇语。欧公〈梅圣俞志〉用此格”。他也在〈马少监墓志铭〉一文的尾批中如此指出：“此欧文〈黄梦升〉、〈张应之〉诸作之祖。”

第三节 唐顺之的文学观：“本色”、“文法”

唐顺之《文编》的选文比例较为偏重唐宋和秦汉两代，大致可见他认为学习古人作文技法的两大源头便是唐宋文与秦汉文。秦汉文抑或唐宋文，亦是明代文人所公认的两大作文取法对象。嘉靖年间，前七子和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的文学观点，主张为文当学秦汉之文，并认为汉以后文无可观，后人便把他们称为“秦汉派”。⁴另一边厢，唐宋派以唐顺之为核心则认为学习文章应当从唐宋的文章先入手，诚如他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说道：“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他认为秦汉文与唐宋文在作文技法上有差别，一为无法之法，一为有法之法。

秦汉文是无法之法，先秦两汉的人作文还未有自觉明确的文法意识，尚处于探索追寻为文技法的阶段，文章多是质朴自然，因此后人没有可以下手学习的方式，无法可循。至于唐宋文，唐顺之则认为乃是有法之法，唐宋人作文已经有十分明确且自觉的文法意识，各种类型的文章技法都已发展纯熟，并形成定型，后人也容易沿着前人的为文途径掌握作文诀窍。因此唐顺之认为只要学好有法之法的唐宋文，便可以写好文章，为此才编选了《文编》，着重圈点出唐宋人为文之法。

然而前七子早期在提出“文必秦汉”之时，其实也同样强调了为文“法

⁴ 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云：“明人论文，自宋濂以降至王唐茅归，推尊八家，此一派也；前后七子进而高论秦汉，此又一派也。”见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235。

度”的重要性，诚如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梦阳就曾在〈驳何氏论文书〉中提出：“规矩者，法也。仆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仆窃古之意，盗古之形，剪裁古辞以为文，谓之‘影子’，诚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犹班，圆倕之圆，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⁵由此可见，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也是同样看重为文之法度，并且对法度的诠释与唐顺之的相去不远。郭绍虞认为唐顺之所提出的为文之“法”乃是要与秦汉派立异，其实秦汉派论文也讲法，不过对“法”的意义又各有别。秦汉派的“法”“重在气象，气象不可见，于是于词句求之，于字面求之。求深而得浅，结果反落于剽窃摹拟。唐、宋派之所重在神明，神明亦不可见，于是于开阖顺逆求之，于经纬错综求之，由有定以进窥无定，于是可出新意于绳墨之余”。⁶因此要谈论唐顺之的“法度”必须与他另一个重要的文学观点——“本色论”联系在一起。

唐顺之为文和论文特别推崇文章的“本色”，即“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间见”；有此“本色”，即可“但直摅胸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⁷“本色论”既是唐顺之的主要文学理论，亦是他评点文章的主要标准之一。

唐顺之“本色”论的中心在于：一、为文当有“真精神”，也即是“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二、当“直摅胸臆，信手写出”。对于“真精神”，

⁵ [明]李梦阳，《空同集》卷62，《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262，页565-566。

⁶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页207。

⁷ [明]唐顺之，《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四（明嘉靖癸丑32年本，1533），页53。

唐顺之是如此解释道：“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千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比”，“必先不为习气缠绕，不使欲障起灭，好是懿德，好仁无尚，真消息也。”此外，唐顺之在《文编序》称：“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他亦称为文当“下数十年无渗漏的工夫”，方始“于清明中稍见得些影子，原是彻天彻地、灵明浑成的东西。”袁震宇在其《明代文学批评史》中认为，唐顺之此种既要“洗涤心源”，又要“使欲障起灭”，更要好“德”好“仁”，正是王阳明所倡导的“虚灵明觉之良知”。他进而言及唐顺之此种言“真精神”、“神明”与王阳明的“良知”都是相近的概念，是一种虚灵的超然外物所在，明显可见唐顺之论文带有浓厚的心学内省思辨的色彩。⁸这也形成了唐顺之与茅坤以及归有光二人的文论之不同之处。

以“本色”一词作为论文的比喻，最早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然而刘勰此处的本色并非与文论有关，“本色”与论文相关当始于宋元以后，主要是指文体要符合其特点。稍后的严羽就曾以“本色”来论诗：“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⁹严羽就认为妙悟乃诗之根本特征，故称之为本色。

⁸ 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6 - 页7。

⁹ [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页10。

然而唐顺之所论的“本色”与以上诸家却又不尽相似。唐顺之所论的“本色”并非专指儒家，而是兼指诸家，如其在〈与茅鹿门主事书〉一文中曰：“秦汉以前，儒家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家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¹⁰此处所言当指向各家的特色，不相互因袭。左东岭将唐顺之的“本色”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必须有自我的特性，二是在本色之中又有高低之别。¹¹贝京更进一步认为唐顺之的“本色”是指向独特精神和独得之见。¹²只要文章具有独特精神，有真见识，便能写出宇宙间最好的文字了。是以他在评论韩愈文章之时，会以最能展现韩文“本色”的篇章为主，并指出此类文体的独特所在。这也是唐顺之大量选录韩愈的“书”、“序”、“墓志铭”、“杂著”及“行状、祭文”类文章的基础缘由。

除此之外，唐顺之在〈与莫子良主事书〉一文中也曾言及“况好文字与好诗，亦正在胸中流出，”¹³他强调诗文的抒情功能，要求诗文必当出自

¹⁰ [明]唐顺之，《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四，页53

¹¹ 左东岭除了把唐顺之的“本色论”划分成两个层次，也进一步指出唐顺之的本色论是从王阳明那里改头换面而来，把本色论完全纳入阳明心学的之中。见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页461。除了左东岭以外，雍繁星在其论文中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更认为唐宋派是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见雍繁星，〈阳明心学与唐宋派〉，《首都师范法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页93-96。然而，贝京在其论文中却认为唐顺之的“本色论”并未只是停留于道德论的层面，而是从审美角度去看待道德以至更广泛的自然之道与体道的意义，把唐顺之的思想纳入阳明心学是受到黄宗羲的影响，并不完全正确，详见贝京，〈唐顺之本色论重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页81-85。

¹² 贝京，《唐顺之本色论重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三期，2005），页82。

¹³ [明]唐顺之，《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四，页54。

胸臆，回归心性。他在评论韩愈笔法之时也点出韩愈文章具有“直”之特点，直接抒发胸臆，这与唐顺之的观点不谋而合，也可以说这是唐顺之因袭了韩愈文章之特色。

除此之外，唐顺之论散文，重在整体之追求，此为其所谓为文之法，如其在〈文编序〉言：“文而至于不可胜穷，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则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其窥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驳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尝不在焉。所谓法者，神明之变也。”他在《答茅鹿门知县》也称不再“语人以求工文字”，应该要谆谆探求文章的本源：

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间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¹⁴

唐顺之以为为文应该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法度。他编选《文编》亦是要借此阐发他的为文之法。罗宗强认为唐顺之的法度可理解成整体表现的能力，而茅坤所讲的法则是关于文章的写法。¹⁵有关茅坤法则的论述于下一章详细论之。

而唐顺之所谓的“文法”，按照在〈文编序〉中所说：“然则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

¹⁴ [明]唐顺之，《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四，页52-53。

¹⁵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442。

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其窥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驳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尝不在焉。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学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所谓“法”即是“神明之变化”，只要“文”中有“法”，方能展现其“神明”，这便是唐顺之“文必有法”的观点。“法”者，原义是指向刑罚之法，后引申为楷模之法。唐顺之对“法”的诠释，依照《文编》而言就是文章技法，这其中就涉及了文章命题、篇章布局、练字遣句以及叙事手法等为文的标准与方式。

从上述可见，“本色”说和“文法”说乃是唐顺之最基础的文学观点。唐顺之的“本色”说和“文法”说亦正是自韩愈而来。韩愈曾提出“气盛言宜”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尤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¹⁶他把“气”和文章语言划上等号，将“气”拟作水，将言“拟作水中的浮物，水势大的话则无论大小的浮物都会漂浮。只要“气”充足，无论语言高低如何，都能写出一篇好文章。韩愈这种说法其实是上继孟子所强调要培养仁义之心和善养浩然正气而来。他认为只要作家加强自身的修养德行，当德行达致一定的境界就能创作出好的文章。因此，他关注的是如何成为有仁义之人和培养浩然正气，显然唐顺之的“本色”说正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师法对象方面，韩愈曾强调“师其意不师其辞”（〈答

¹⁶ [唐]韩愈，〈答李翊书〉，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1455。

刘正夫书》)。¹⁷此处所指的“辞”是指向文章中的篇章字句，他对于文章的法度历来都是强调要学习古人的主旨，而非剽窃他人的文辞。无独有偶，唐顺之的“文法”说也体现出相似的观点。

为文能准确认题、立意方是文章关键之处，唐顺之的《文编》作为古文评选本，为举子勾勒提要，在评析韩愈文章时多次提及韩文的认题、立意的部分及其特色。然而，唐顺之虽然“十分推崇有法可循的八大家文，但他对无法可循的秦汉文并不偏废，故‘文无定法’首先就意味着学法不可为法所拘”。¹⁸是以，他在编选《文编》时对八大家文的评点都会注重圈出每位作家的写作特色，用意为了要让学者能汲取各家所长，不为一家之法所拘。就正如唐顺之在评点王安石的〈上人书〉一文时指出：“半山文字，其长在遒紧”，又在苏辙〈民赋序〉中评曰：“平正通达，不求为奇，而势如长江大河，是小苏之所长也”，再如评欧阳修〈菱溪石记〉时曰：“零零碎碎作文，欧公独长”。

唐顺之以为最能体现韩愈“本色”的文体当是书序、墓志铭类文章，并认为韩愈文章主要以真情抒发，直抒胸臆，亦“奇”取胜。唐顺之曾编有《荆川稗编·文章杂论》二卷共五十九条，全是采撷古人有关文章的论说而成，选材重在文章之体、态、气、韵，贵求法则，不难从中窥知其所谓“文章”一词，重在文采。当明清八股大盛之际，其于场屋举业者有所裨益，且可从中窥见唐氏论文之大要。通过唐顺之对韩文的评点可见他乃

¹⁷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2050。

¹⁸ 孙彦，〈从《文编》看唐顺之的“文法”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12月第四期），页126。

是以明代时文之法来评点古文。此种以时文评点古文的方式，不仅在《文编》中出现，即便是《文章指南》乃至受唐顺之影响的茅坤所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亦复如是。

小结

唐顺之作为明代唐宋派中影响较为大的代表人物，《文编》的编选不仪仅是为了指导举业，也更是为了阐发他的文法观。《文编》的选文比例侧重唐宋和秦汉两代的文章。《文编》大量选录了韩愈的墓志铭、书、序、杂著和行状类文章，这样的选录标准正式延续了宋代以来文论家对韩愈文章的评选方式，不管是归有光，还是唐顺之，皆延续了此种选法。

唐顺之在评论韩愈文章多从结构和文法着手，也点出了韩愈不同文体之特色，如韩愈“序”文的特色为“奇”，源于其立意巧妙了；而“书”的特点则是多变化的表达、“直”和前后呼应；“墓志铭”文重在叙述手法的使用。

与归有光不用，唐顺之注意到韩愈“墓志铭”体的文章乃是学习与借鉴司马迁的笔法。然后他也指出了韩愈虽在学习古人，却也会力求新变，自成一格。唐顺之也指出韩愈此类文体对后来宋代欧阳修和王安石等人笔法之影响。这也正引证了唐顺之所谓的唐宋之文乃是有法之文的说法。而唐顺之对韩愈文章的评点也正是源自于他本身的文学理论——“本色”论和“文法”说。

至于，唐顺之本身的“本色”论则是指向文章的“真精神”，须是直抒胸臆，并且兼容诸家特点。而唐顺之的“文法”说则是指向文章命题、篇章布局、练字遣句和叙事手法。唐顺之这两大主要的文学理论也是自韩愈而来。

第五章：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录韩文考辨¹

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叙〉中对韩愈给予高度评价，言及“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序、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然大较并寻六艺之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后又于〈柳柳州文钞引〉中亦说道：“昌黎韩退之崛起八代之衰……昌黎之文得诸古六艺及孟轲、杨雄者为多。”

由此可见，茅坤不仅推崇韩愈之文，认为其文起了“崛起八代之衰”的气势，更在其余诸人的小引中以韩愈文章为准绳对诸人文章的特点作横向比较，以此凸显各家文章的风格与特征。故此，本文拟就茅坤所编选之韩愈文章及其评析，并结合茅坤本身的文学观点，一窥其对韩愈之文的笔法评价。

第一节、《唐宋八大家文钞》所录韩文论析

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公文钞》（以下简称《文钞》）一共选录了韩愈表状九篇、书启状四十六篇、序三十三篇、记传十二篇、原论议十篇、辩解说颂杂著二十二篇、碑及墓志碣铭五十二篇、哀词祭文行状八

¹ 按：本文有关茅坤评语的行文皆引自〔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愈文钞》（合肥：黄山书社，2009）。为论述方便，此后相关引文将不赘述。

篇，共一百九十二篇，十六卷。此外，茅坤也作了〈韩文公文钞引〉以及〈韩文公本传〉二篇来补充说明韩愈其文和其人的特色与生平。

以下为所选录韩愈文章之篇目分类一览表：

表 7：《唐宋八大家文钞》所录韩愈文章篇目

文体	所录韩文	篇数
表状	〈进撰平淮西碑文表〉、〈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论补贼行赏表〉、〈复讎状〉、〈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论淮西事宜状〉、〈黄家贼事宜状〉、〈论变盐法事宜状〉	9
书	〈上张仆射书〉、〈上涨仆射第二书〉、〈上兵部李侍郎书〉、〈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上宰相书〉、〈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上考功崔虞部书〉、〈与孟尚书书〉、〈与凤翔刑部尚书书〉、〈应科目时与人书〉、〈与陈给事书〉、〈与于襄阳书〉、〈与祠部陆员外书〉、〈为人求荐书〉、〈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与陈生书〉、〈与孟东野书〉、〈与李翱书〉、〈与崔群书〉、〈与卫中行书〉、〈与少室李给遗书〉、〈与鄂州柳中丞书〉、〈在与鄂州柳中丞书〉、〈与李秘论小功不税书〉、〈与冯宿论文书〉、〈答刘正夫书〉、〈答李翊书〉、〈答殷侍御书〉、〈答张籍书〉	30
书启状	〈重答张籍书〉、〈答刘秀才论史书〉、〈答崔立之书〉、〈答元侍御书〉、〈答陈商书〉、〈答侯继书〉、〈答李秀才书〉、〈答冯宿书〉、〈答窦秀才书〉、〈答吕医山人书〉、〈答胡生书〉、〈答尉迟生书〉、〈答杨子书〉、〈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贺徐州张仆射白兔状〉、〈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	16
序	〈送杨支使序〉、〈送郑尚书序〉、〈送许郢州序〉、〈赠崔复州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殷员外序〉、〈送杨少尹序〉、〈送湖南李正字序〉、〈送水陆通使韩侍御归所治序〉、〈赠张童子序〉、〈送牛堪序〉、〈送窦从事序〉、〈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陆歙州诗序〉、〈送郑十为校理序〉、〈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送王秀才序〉、〈送齐皞下第序〉、〈送何坚序〉、〈送区册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廖道士序〉、〈送张道士序〉、〈送陈	33

	秀才彤序)、《送浮屠文畅师序》、《送高闲上人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荆谭唱和诗序》、《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石鼎联句诗序》	
记传	《新修滕王阁记》、《蓝田县丞厅壁记》、《燕喜亭记》、《河南府同官记》、《画记》、《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科斗书后记》、《汴州东西水门记并序》、《郢州溪堂诗记》、《太学生何蕃传》、《圻者王承福传》、《毛颖传》	12
原论议	《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省试颜子不贰过论》、《诤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改葬服议》、《褙袷议》	10
辩解说 颂杂著	《讳辨》、《进学解》、《获麟解》、《择言解》、《师说》、《杂说四首》、《子产不毁乡校颂》、《伯夷颂》、《张中丞传后叙》、《读荀子》、《读仪礼》、《读墨子》、《送穷文》、《释言》、《猫相乳》、《守诫》、《对禹问》、《通解》、《行难》	22
碑志	《处州孔子庙碑》、《南海神庙碑》、《皇陵庙碑》、《衢州徐偃王庙碑》、《曹成王碑》、《清边郡王杨燕奇碑》、《康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上柱国襄阳郡王平阳路公道神碑》、《平淮西碑》	8
墓志碣 铭	《乌氏庙碑铭》、《袁氏先庙碑》、《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柳州罗池庙碑》、《唐故相权国公墓碑》、《荥阳郑公神道碑》、《太原王公神道碑铭》、《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神道碑》、《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太原王公墓志铭》、《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将军李公墓志铭》、《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志铭》、《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志铭》、《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唐故监察御使卫府君墓志铭》、《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孔司勋墓志铭》、《李元宾墓志铭》、《试大理事王君墓志铭》、《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襄阳卢丞墓志铭》、《河南令张君墓志铭》、《登封县周卢殷墓志铭》、《唐故河南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施先	44

	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女拿圻铭)、〈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瘞砚铭)	
哀词祭文行状	〈独孤申叔哀辞)、〈欧阳生哀辞)、〈祭田横墓文)、〈祭鳄鱼文)、〈祭柳子厚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十二文)、〈赠太傅董公行状)	8

茅坤在〈韩文公文钞引〉亦有提及他收录韩文的情形：“首揭昌黎韩文公愈，录其表状九首，书启状四十六首，序三十三首，记传十六首，原议论十首，辩解说颂杂著二十二首，碑及墓志碣铭五十二首，哀辞祭文行状八首，厘为十六卷。”按照上表重新计算以后，可以发现茅坤实际所录的韩愈文章篇数其实有误，记传应为十二篇，而非十六篇，特此更正。

《文钞》中选录文章数量之最为墓志铭，依次为序、书、辩解说颂杂著。茅坤多番提及韩愈的碑铭文拥有“尤为巉削”以及“盛气掬抉，幅尺峻而韵折少也”的特色。故而，《文钞》中收录之数量亦是占其他文体的最多数。茅坤在篇首论“八大家论例”中就曾言及：“世之论韩文者，其首称碑志，予独以韩公碑志多奇崛险谲，不得《史》、《汉》序事法，故于风神虚或少道逸，予间亦镌记其旁”。由是可见，茅坤以为最能展现韩愈文章特色的主要是碑志以及墓志铭此二者。

虽然茅坤的文学观深受唐顺之的影响，但是他对韩文的侧重则与唐顺之稍有不同。与唐顺之相比较，他更看重韩愈的碑志、序文和记类的散文。他也更在评述中指出了韩愈此类文章的特色。此部分将于下节论述之。

此外，他更认为韩愈的书、记、序、辩、解及其他杂著乃是韩愈所独创，并将之譬喻为禅宗之达摩，此类文章亦选录不少，仅次于碑志、墓志铭之后。

第二节、茅坤之论昌黎本色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韩愈几篇宣传“道统”的重要篇章，茅坤一概将之收录其中，可见，茅坤作为一名选家认同韩愈之文承接道学传统。不仅如此，他也进一步点出韩愈之文得孟子、杨雄的气概。因此，他在评点篇章时也常使用了带有文道合一观念的评语，如：“雅致”、“醇雅”、“严整”、“正大”、“语庄”、“得体”、“深远之思”、“深识之言”等。

茅坤在评定韩愈文章笔法之时，多以司马迁文风和笔法作为尺度与标准，如在〈张中丞传后序〉一文中的“当其围首时，处无蚍蜉蚂蚁之援助，……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句旁评云：“洗发痛快入骨髓，全是子长神解处。”又在〈徐偃王庙碑〉中的“周天子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说，得八龙骑之”句旁批曰：“本世传小说，文类史迁。”〈曹成王碑〉“十抽一推，救兵州东北属乡”，旁批曰：“叙事处亦暗仿太史公”。再如〈平淮西碑〉中“颜、胤、武合功其备，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句旁批：“以下诸将会战次第，大略本史迁绛、灌等列传来”。虽然他以史迁笔法为法度来的评定韩愈文章，但是他在评价韩文之时又提出了韩愈

文章的另一特色：“昌黎本色”，并进一步认为韩愈的碑志与墓志铭尽显其本色。

茅坤直接以“本色”评价韩文文章共有五篇之多，分别为〈为人求荐书〉、〈答陈生书〉、〈张中丞传后叙〉、〈守戒〉及〈曹成王碑〉。他在评点中以“本色”评论韩愈文章的则有〈答刘正夫书〉、〈与李翱书〉和〈上张仆射书〉三篇。茅坤这种以“本色”来评价韩愈文章的评点形式正是受到唐顺之“本色论”的影响，但是唐顺之的“本色论”按上章节所言是从文章内容出发，茅坤的本色一说则是从作品的风格和文句等来评价。

首先，茅坤在〈为人求荐书〉一文中评曰：“善喻是昌黎本色”，又评〈守戒〉这篇时云：“通篇极论正意，只收一句作结，是一体却自〈过秦论〉来。其文章平直通显，反近苏氏，亦非公本色”。他又在〈曹成王碑〉一文中评云：“文有精爽，但句字生割，不免昌黎本色”，在此篇文章的尾评中又指出：“昌黎每自喜陈言之去，故〈曹成王碑〉当亦属公得意之文。而愚见则以务去陈言，却行穿凿生割，亦昌黎病处”。曹成王碑系韩愈为唐李皋所写的碑文，文中确实多使用奇字僻句，譬如：“群能着职，王亲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诛五畀。舰步二万人，以与贼遇，喙锋蔡山，踣之；剡薪之黄梅，大鞞长平，鏖广济，掀薪春，撇薪水，掇黄冈，笊汉阳，行跣汉川。”²另外，他在〈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进见上殿，拜跪给扶，赞元经体，不治细微，天子敬之”句旁，评曰：“昌黎生平得力处在去陈言；生平为倔强荆棘，不能如史迁宕冶处，亦在去陈言。”

²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2155。

由是可见，茅坤所言“昌黎本色”首先体现在韩愈奉行“陈言务去”的为文法则，以致“文有精爽”。

其次，茅坤在韩愈的墓志铭文章之中，多处指出韩愈使用奇字僻句手法。茅坤不仅在韩愈的墓志铭文章中，多番使用“奇”字来评定韩愈文章，更于其他文体中亦一一点出韩愈之“奇”处，试将《文钞》全书中有关茅坤对韩愈文章“奇”之评语总结于下表：

表 8：茅坤以“奇”为评语

韩愈篇章	茅坤评语
答吕医山人书	奇气
送幽州李端公序	结体奇
送窦从事序	奇崛
送齐皞下第序	结句奇
送廖道士序	奇
送高闲上人序	开辟以来奇崛处、奇思、奇而又奇
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	怪怪奇奇
蓝田县丞厅壁记	词气多澹宕奇诡、奇怪、结奇
燕喜亭记	奇伟
毛颖传	奇、又奇
讳辨	嫌名独生一脚作波澜，奇极、奇甚，愈转愈紧而愈不穷、此文反覆奇险
进学解	奇诡
获麟解	此奇兵也
杂说	变换奇诡
送穷文	奇

对禹问	议论奇绝痛快
行难	文极奇诡
衢州徐偃王庙碑	立论奇高，造语怪伟、昌黎公至意平处便造奇语、铭亦奇绝
曹成王碑	事迹奇，摹写亦奇、惟陈言之务去，此昌黎其妙处、铭亦务奇语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志铭	语奇
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	奇气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奇气、铭尤奇、澹宕多奇
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	奇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昌黎问多奇崛，然亦多生割处
贞曜先生墓志铭	奇语，欧公《梅圣俞志》用此格
瘞砚铭	瘞砚一段光景，颇奇气
祭河南张员外文	公之奇崛战斗神鬼处，令人神眩

由是可见，茅坤在评论韩愈的篇章之时，共有二十七篇皆以“奇”为主要评语。茅坤在其《八大家文钞论例》中对韩愈文章如此高度评价道：“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擅长使用各种寓意来发论述，故此，茅坤认为“奇”，具有个人独特之点，亦是韩愈文章之“本色”之一。

茅坤亦指出韩愈碑志、序文和记类文章一共有四方面的特色。第一为韩文看重叙事技巧，正如他在评《魏博节度观察使国公庙碑铭》云：“按田弘正本传世多臣顺大节，昌黎公特隐括其以六州还朝廷一事，而颂美之

词特详铭中，其得体”。他在这里所提出的“隐括”和“特详铭”正是碑铭类文章在叙事时所讲究的技巧。他在韩愈其他碑志文章如〈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和〈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中也有分别如此评道：“简而法”、“志中无他述，独指采药煮黄金一事，文旨自在澹宕隽永”。这些都是指韩愈碑志类的文章叙事方面详略得体。他更对韩愈〈送董邵南序〉此篇序文推崇备至，评曰：“文仅百余字，而感慨古今，若与燕赵豪俊之士，相为叱咤呜咽其间。一涕一笑，其味不穷。昌黎序文当属第一首。”此文篇幅精短，但文章简中有繁，“感慨古今”，叙述同样详略得体。

其二为韩愈文章结构精致，表达方式巧妙。茅坤在评〈送浮屠文畅师序〉言：“高在命意，故迥出诸家。而开阖顿挫，不失尺寸”。又评〈石鼎聊句诗序〉言：“文极顿挫。后之法家多有痕迹，惟公不然，纪事纂言如太史公”。可见，茅坤在评论韩愈文章时非常看重其文章结构的跌宕顿挫，更进一步指出韩愈以后，此种顿挫之法后人更学不会，没有韩愈使用得好，甚至可以与太史公司马迁媲美。同时，他也在评〈衢州徐偃王庙碑〉云：“以客形为主，而立论奇高，造语怪伟当是昌黎文学。按偃王事不见传记，昌黎特采世所传小说，撰次本末；而其议论归本处，当以徐之公族子弟祠偃王于其土为是”。茅坤认为韩愈此篇碑文不仅“立论奇高”，更是以传奇笔法来记述偃王的生平事迹，结议论与叙事为一体。这正能体现出韩愈文章巧妙的表达方式。茅坤在韩愈另外一篇的传记散文〈圻者王承福传〉中如此评曰：“以议论行叙事，然非韩文之佳者”。可见对茅坤而言，传记应当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而韩愈此篇却是以议论为主，因此茅坤才认为此篇并非韩愈之佳作。

其三为韩愈文章以气行文。他在评〈送王秀才序〉中云：“通篇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自己门户，故其文有雄视一世气”，又评〈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云：“前半是经，下半是纬，而气亦跌宕”，再如评〈蓝田县丞厅壁记〉云：“愤当世之丞不得尽其职，故借壁记以点缀之，而词气多澹宕奇诡”。他在此处指出“气”是作家为文之根本，当作家拥有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时，而后便有“跌宕奇诡”的“文气”。而此种“澹宕奇诡”的文气也正是构成韩愈文章尚“奇”的重要因素。

其四则是韩愈文章中独特的字法与句法。在唐宋派诸子中，茅坤可以说是对韩愈文章字法和句法的运用下工夫最深的人。他在评〈乌氏庙碑铭〉曰：“序袁氏世系，千余年若一线，中多荆棘，句字不可读，系之以韵，似追《雅》、《颂》。”又如其在〈唐故相袁国公墓碑〉评云：“直叙中多句字生蹇处，铭可诵”。再如〈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明〉中评曰：“此篇大略类传，而中多险棘句”。茅坤使用“多荆棘”、“生蹇处”、“险棘句”来表示韩愈多使用生僻拗口的字句。

此外，茅坤除了指出韩愈之碑志与墓志铭的“昌黎本色”之外，亦同时注意到宋代古文家对韩愈文章的继承与创新。他指出欧阳修的序、记、墓志铭诸文体在笔法上是学习和借鉴韩愈而成。如其于韩愈〈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君执弓，腰二矢……”句旁，批曰：“后欧阳公摹画此文，志王德用墓”，又于〈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大历初名能为诗文……”句旁，批曰：“前叙历官，后叙事行，欧公、荆公多用此体”。〈贞曜先生墓志铭〉端序则见，长而愈蹇，涵而操之……”句旁，批曰：“奇语。欧公〈梅圣愈志〉用此格”。他也在〈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一文中

点出：“本其妻夫人泣哀之言为志，欧公志多慕此法”。

除了上述碑志和墓志铭以外，茅坤亦在韩愈其他文体的文章中，指出欧阳修为文所宗之法，如其于〈送廖道士序〉一文中云：“文体如贯珠，只此一篇，开永叔门户”，又评韩愈〈燕喜亭记〉一文时云：“淋漓指画之态，是得记文正体，而结局处特高。欧公文大略有得于此”。茅氏此番分析乃是从追溯文法渊源的角度上，特别是墓志铭文类，指出了韩文笔法是形成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文之主要源头。而这一看法也与上一章中唐顺之频频指出宋代古文家所宗韩愈文法的观点相似。

最后，茅坤以“生割”论“昌黎本色”，并以为此系韩愈文章的弊端。如茅坤在〈曹成王碑〉批曰：“但句字生割”、“却行床凿生割，亦昌黎病处”。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亦有评道：“然亦多生割除”，又如他在〈唐故相权国公墓碑〉一文中言及：“直序中多句字生蹇处”。这也是茅坤最为反对之处，也既是上文所提及的“险棘句”之意。此一说法对后来影响深远，后来学人不苟同其意，亦成为后人诟病茅坤选文不精的一个要据。

第三节、茅坤之文学观点

《文钞》可以说是茅坤文统观的直接产物，从分析此书的编选体例和评点内容便可一窥其文学观的思想面貌。林春虹认为茅坤以八大家为编选

体例并体现于题名中实则为了体现茅坤的文统观念。³从以八大家来题名，将唐代的韩愈列于首位，便足以突显茅坤的文学观念及其文统观。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对文统的产生具有重大的意义。

茅坤在书中〈总序〉便已提到：“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宋兴百年，文运天启。于是欧阳公修，从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韩愈书，手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而起。苏氏父子兄弟及曾巩、王安石之徒，其间材旨小大、音响缓亟虽属不同，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籍之遗，则共为家习而户眇者矣！”茅坤在选录了韩愈之外，又选入柳宗元是为了要延续韩、柳合称的惯例；欧阳修是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航者，曾巩、王安石和三苏则是代表了宋代文坛的新生力军。由此可见，茅坤的文统观是兼顾经史与文学，以经学作为根本的宗旨。

选本不仅仅反映了茅坤对诸家文章的评价，同时也体现了他自身的文学观念。茅坤在《文钞》总言里说道：“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宋兴百年，文运天启。于是欧阳公修，从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韩愈书，手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而起。苏氏父子兄弟及曾巩、王安石之徒，其间材旨小大、音响缓亟虽属不同，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籍之遗，则共为家习而户眇者矣。”茅坤在〈韩文公文钞引〉中亦同样认为为文当“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艺者之遗。斯之谓古作者之旨云尔”。他在〈复唐荆川司谏书〉一

³ 林春虹，《〈唐宋八大家文钞〉与茅坤的文统观》（《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二期），页116。

文中回覆唐顺之曾提及自身的文学观点：

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马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

某初闻而疑之，又从而思之，其大较虽近，而其中之深入出，窃或以为稍有未尽然者。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自不同。譬如堪舆家所指“龙法”均之萦择起伏，左回右顾，前拱后饶，不致冲射尖斜，斯合“龙法”。然起来龙之祖，及其小大力量，当自有别。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其祖龙是以。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⁴

茅坤的“本乎道”、“按古六艺者”、“当本之六经”其实是指向先秦两汉古文，他在推崇唐宋古文的同时，亦推崇秦汉古文。多数学者皆认为唐宋派唯唐宋古文是崇，更认为他们提倡唐宋文风，因而称为“唐宋派”。⁵刘大杰更称茅坤所推崇的文学复古运动应当称为宋文运动，因他们提倡宋代欧曾通顺的文体。⁶私以为，其实这都是片面之词。归有光《文章指南》以及唐顺之《文编》不仅选录唐宋诸家散文，亦大量选录了先秦两汉的散文。这种推崇唐宋诸家古文，博采历代古文方是最能代表唐宋派诸家的文论观。而茅坤所讲的“道”则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因此，他在《文钞总序》中如此评道韩愈“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选

⁴ [明]茅坤，《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页191-192。

⁵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页96。

⁶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901。

录韩愈散文正因为其散文正好反映了茅氏此种文学观点。

茅坤在〈文诀五条训缙儿辈〉一文中如此总结自己的为文经验：“吾为举业，往往以古调行今文……个中风味，须于六经及先秦两汉书疏与韩苏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于胸中，将吾所为文打得一片，湊泊处则格自高古典雅。”⁷他也进一步在此篇文章中提出了“认题”、“布势”、“调格”、“炼辞”和“凝神”五种写作的技巧。此外，茅坤又在《临川文钞引》中说道：

“王荆公湛深之识、幽渺之思，大较并本之古六艺之旨，而于其中别自为调，镌刻万物，鼓铸群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⁸他同样在〈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言及：“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以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尽相同！”⁹以上言说无不在强调为文既要继承古人的同时亦要独创，此正体现了其主张学古而不拟古的文学观。这个文学观亦在茅坤评品韩愈文章时多次展现。

最后，茅坤强调文学的情感本质和情感鼓动荡人心的力量。茅氏评韩愈的〈祭田横墓文〉一文时指此文乃是“借田横发自己一生悲感之意”。他在评〈送董邵南序〉一文曰：“叱咤呜咽”，又在评〈祭十一郎文〉一文时说道：“通篇情意刻骨，无限凄切，祭文中千年绝调”。最后他在〈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一文中也评道：“文婉曲感慨”。由此可见，在众多情感当中，茅坤尤其看重感慨呜咽之情。

⁷ [明]茅坤，《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页862-864。

⁸ 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陕西：三秦出版社，1998），页2805。

⁹ [明]茅坤，《茅坤集》，页191-192。

纵观而言，茅坤所提出的为文法度不仅仅只是关注文章的谋篇布局和文章结构，更多的在于他继承了唐宋文“有法可循”的思想，将为文之法和文统结合在一起，隐含于作家的性情之中。韩愈分别在〈答尉迟生书〉和〈答刘正夫书〉中提到：“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¹⁰在强调文章语言的同时，韩愈也强调要“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¹¹韩愈认为文章不仅是要学习古圣贤之道，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文辞方面自我创新，不因循守旧，照搬古人的言辞。显然地，茅坤在这一方面确实很好地继承了韩愈的思想。

茅坤与唐顺之、王慎中等人一样，在早期也曾有过一段追寻前七子的创作历程，虽然稍后在文法观念上已与前七子不同，但在是师法对象上，他依旧与其他的唐宋派成员不相同。他曾经〈复唐荆川司谏书〉一文提出了“龙法”这一概念。茅坤的“龙法”是指一篇文章中前后照应、转折起伏的为文之法，更把六经视为祖龙，认为文章师法的本源应该上溯至六经，而近世的文章则过于浅近。由是可见，茅坤的这种文学观念实际上很大程度依然是受到了前七子的影响。惟稍后他在唐顺之几番的影响之下，方才逐渐接受唐顺之师法唐宋的主张，开始关注唐宋散文，并且在进一步提出“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创作理论。正如他在〈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一文中所指出：“盖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聪明、智慧，操且习于

¹⁰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1462、2051。

¹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1455。

其间，亦各有所近，必专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¹²他深以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色，只要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专注于自身的长处并将之发挥到极致，用适合的方式展现出来以成就自己的名声。若将这种观念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则必须要清楚知道作家本身的才智和个性使用书写何种文体，如此才能写出同仁义之人一样的文章。茅坤认为为文最基础的法度就是要符合作家自身特点，同时也要把握好事物的原本特征。正因为如此，他在〈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中才会对韩愈文章的特点有了这么一番的评价：“予尝有文评曰：韩愈之文也；巉岩崩崩，若游峻壑峭壁”。¹³这也反映出了茅坤自身的论文特点。

此外，他在〈复唐荆川司谏书〉一文中也有提出了“神理”说：“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认为写文章不必刻意地去模仿司马迁、韩愈、欧阳修或曾巩等人，只要把握住前人文章中的神理，再依照自己内心的想法进行创作便可。这其实也是茅坤“万物之情，各有其至”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茅坤而言，不管是宗秦汉散文抑或是宗唐宋但闻，不管何种表现形式都不重要，最主要的是将神理作为写文章的源头。他也有在〈与郁秀才书〉中提到：“大都近代以来，缙绅先生好摹画《史记》、《汉书》为文章。而于公卿士庶志铭传记，特借《史》、《汉》之肤发以为工。而于斯人之神理，或杳焉而未之及……据愚见，业已删其复者、杂出者，并遗其繁芜而无所事者”。¹⁴他指出仅仅追求“肤发以为工”，只在外在形貌上相似，却又无法刻画出真实的神

¹² [明] 茅坤，《茅坤集》，页 195-196。

¹³ [明] 茅坤，《茅坤集》，页 833。

¹⁴ [明] 茅坤，《茅坤集》，页 286。

态，这是缺乏“神理”的，必须要对已经掌握的材料进行选择，删除繁杂复叠的内容，把握最有特点的事物进行描绘，才是拥有“神理”。按照茅坤这说法，“神理”说与上一章中所提及唐顺之的“真精神”颇为相似。

后人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评价褒贬不一，如清人王夫之评曰：“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有《八大家文钞》而后无文。”¹⁵近人如付琼亦认为八家选本完全是服务于举业之用，茅坤所称的继承“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仅仅是“门面之话”则已。¹⁶当前更多学者则持有折中想法，一方面认为八家选本确实是为了当时科举考试所选，另一方面却认为八家选本在客观意义上推动了唐宋派文学思想的传播。

无可否认地，在明中晚期乃至清朝时期，茅坤所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确实是广泛流传，这主要是因为此书所使用的评点机制的适用性和耐读性，对童生举业训练有实际的用途，也指引了学文的便捷途径。就如林春虹在其论文〈茅坤与明代古文评点的兴盛〉中以崇祯年间所刊刻的《四大家文选》为例，说明这部借归有光之名的选本，其中所收录的评点实际上是从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全盘照搬及稍作更动而已。¹⁷这恰好可以反映出明末清初的古文选本对茅坤评点的重视。

不仅如此，清代众多的八家选本也皆都是在茅坤此选本的启发之下产生。梅篮予的硕士学位论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渊源与流传考论》

¹⁵ [清]王夫之、戴鸿森点校，《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姜斋诗话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页205。

¹⁶ 付琼，〈唐宋八大家选本与明清文学教育的适配〉（《天府新论》2008年），页139-140。

¹⁷ 林春虹，〈茅坤与明代古文评点的兴盛〉（《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三期）页49-53。

中的第二章至第四章便已梳理了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在明代中晚期至清代中后期流传和传布的情况。¹⁸自从茅坤此书刊行以后，明清两代便出现了大量的赝作，《文钞》更成为了明清两代学子的科举读本。比较有名气的便有吕留良的《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蔡方炳的《八大家文选》、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沈德潜的《唐宋八家文读本》、秦跃龙的《唐宋八大家文选》等等，都是受到茅坤的《文钞》的影响而产生的文学产物。¹⁹而茅坤的《文钞》一书中又收录了唐顺之《文编》中对八家散文的部分评点，因此可以将茅坤此书看成是唐宋派等人对明清之际文论或散文创作的影响。

《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一部选本，主要通过随文批点、总序、论便及小引的方式，零散地表述茅坤的文学主张。纵观《唐宋八大家文钞》中给予韩愈的评语和其序引，并且联系茅坤的其他文学论述，便不难发现茅坤对于韩愈文章的批评是具有系统性和创造性。他尊重韩愈作为作家的个人特色，非常看重文学本体的价值，注重对文学特性的研讨。茅坤在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时不以文章形式入手，而是重点揭示唐宋文章的潜在价值，从“文以明道”的立场出发，企图确立唐宋文章的“正统”地位。刘尊举也同样指出茅坤的“文论观”其实是要针对在李梦阳影响下盲目崇高的创作风气而提出，更是对唐宋派其他人物——王慎中和唐顺之二位的文学思想的传承。²⁰秦汉派与唐宋派的辩争固然是茅坤编选此书的外在因

¹⁸ 梅篮子，《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渊源与流传考论》（中国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¹⁹ 蔡定昌在其论文中指出了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虽然命名方式与茅本相似，可是在编选目的和标准上却又与茅坤不同，见蔡定昌，《论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继承与删改》（《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7月第五十二期），页227-272。

²⁰ 刘尊举，《唐宋派“师法唐宋”辨析》（《古代诗学的现代阐述》2011年8月），页54-

素，但就茅坤自身而言，这也是对自己学术思想的一大总结。

茅坤的学术思想源于唐顺之，编选古文亦受其文学观念之影响。姜云鹏在《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言及：“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纂，从选文、圈点、批评都深受唐顺之《文编》影响，唐顺之具有深厚的古文学养，其评点十分简洁，导致初学古文的士子不明就里，茅坤基于此点，编撰《唐宋八大家文钞》，体例清晰，从而使其风行天下。”²¹全华凌认为茅坤作为唐宋派评点理论家中最具实力的大匠，在长期研究韩文的过程中树立其了一种对韩愈和韩文十分深厚的崇敬心理。²²夏咸淳在其一文中认为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不仅代表了一个书系那么简单，更是代表了明代文学演变的一种趋势和潮流，标志着明代中后期以后唐宋派的崛起。²³虽然从《唐宋八大家文钞》上确实可见《文编》之影子，然而在评点方面，茅坤对韩愈文章的部分笔法评论却展现出有别于唐顺之的观点。

小结

茅坤的《文钞》亦是收录韩愈的墓志铭、序、书类的文章为最。虽说茅坤的《文钞》是受到唐顺之《文编》的影响，但是他却点出了韩愈墓志铭、碑文类的文章特点是“尤为巉削”、“盛气掬抉，幅尺峻而韵折少也”以及“奇崛险谲”，不得司马迁的笔法。而他对韩文的侧重点与唐顺之稍

55。

²¹ 姜云鹏，《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页81。

²² 全华凌，《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一期），页53。

²³ 夏咸淳，《《唐宋八大家文钞》与明代唐宋派》（《天府新论》2002年第三期），页82。

有不同，更为看重韩愈的碑志、序文和记类的散文。此外，他更认为韩愈的书、记、序、辩、解及其他杂着乃是韩愈所独倡，并将之譬喻为禅宗的达摩，给予极高的评价。

在评论韩愈文章笔法时，他与唐顺之一样，注意到韩愈多学习司马迁的文风和笔法，并于选文中一一指出。他更以唐顺之的“本色”二字直接点出韩愈的文章具有“昌黎本色”。然而茅坤此处所为的“本色”却又与唐顺之的“本色”稍有不同。唐顺之的“本色”是从文章内容出发，而茅坤的“本色”则是从作品的风格和文句下手。

茅坤认为韩愈的“本色”大体呈现在其善于譬喻，文章平直通显，去陈言以致有精爽，但是字句却生割。因为受到唐顺之的影响，他在评论韩愈墓志铭文章也以“奇”字为主要评语，同时亦指出韩文重叙事技巧。也注意到宋代古文家对韩愈文章的继承与创新。与唐顺之不同的是，他更多看重韩愈文章中的字法和句法，并指出韩愈多使用生僻拗口的字句。

虽然茅坤的文学观点大体源自唐顺之，对于“道”的观点，茅坤则是指向儒家的正统思想。他认为为文既要继承古人的同时亦要独创，主张学古而不拟古。茅坤所提出的为文法度不仅仅只是关注文章的谋篇布局和文章结构，更多的在于他继承了唐宋文“有法可循”的思想，将为文之法和文统结合在一起，隐含于作家的性情之中。这也是茅坤对韩愈文学思想的继承。他也提出可“万物之情，各有其至”和“神理”之说的观点。这二者的观点皆是源自于唐顺之而来。

结语

总而言之，由元朝进入到明朝的学者文人多数都认为，振兴学术文艺，一定要恢复程朱理学道统，以及继承唐宋以来韩愈和欧阳修等人的文统，并且还认为舍此正道而旁求他法，必定会入狭途邪门。尊唐宗宋的潮流蔚然兴起，唐顺之、归有光和茅坤等人为其代表人物。他们不但在理论上大力宣扬唐宋文统，而且积极从事创作实践活动。他们深知选本的作用，花了极大力气评选诸家古文，以传播扩大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和社会影响。

三人精研唐宋文，从选集上来看，可见选文较偏重唐宋二代，唐人尤重韩愈之文。通过评点有法可循的唐宋文，总结出为文之道，并于书写时文时融入其中。以致于后来清代桐城派方苞也对唐宋派诸子的文章给予高度称誉，“至於唐、归，然后以古文为时文，理精法备，而气益昌”。¹

自唐代韩愈以来，“文以明道”之说一直为文人所看重，唐宋派，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人亦复如是，不约而同皆力主文以载道的主张。虽然文章必须载道，但是他们亦讲求作文之法，光有内容而无文辞，仍无法写就一篇佳作。因此个别所编选选本基于为了要指导学子时人写作，均有提及具体的方法。归有光《文章指南》以及唐顺之《文编》不仅选录唐宋诸家散文，亦大量选录了先秦两汉的散文。这种推崇唐宋诸家古文，博采历代古文方是最能代表唐宋派诸家的文论观。

¹ [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下册，集外文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776。

归有光、唐顺之、茅坤所编之选本皆以唐宋八家为主，其中更将韩愈列于八家之首。由是可见，这是明代文学演变的一种趋势和潮流，更是唐宋文派古文理论“文必唐宋”的依据。不管是主张学习欧阳修或是苏轼文笔，都认为代表着宋代古文鼎盛之期的诸人的文法都是本自于韩愈的笔法，所以才将韩愈列为八家之首。虽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明确标出“八大家”之名目，但是崇尚唐宋古文，以八家为宗，尤以韩愈为八家之首，并非茅坤一人私见，而是唐宋派诸人的共识。

归有光所编撰《文章指南》不仅总结自己平时的读书心得，也是为了要授予他人作文之法，书中所沿用的评点机制与评点符号也大多延续自宋代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一书。而此书的文章的选录主要是以唐、宋两代的作家为主，通论、立意论、结构论、引证论和修辞论来分类所选录的文章。归有光所谓韩愈文章之“法度”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为文之法。对归有光而言，“文”是“道之所形”，而“道”便是文章的内容。他特别强调文章“道”和“气”的重要性。他这种对“文”和“道”观念正是继承了韩愈文道并重的文学观念。但是二者之间依然存有不同之处，韩愈所指向的“道”是儒家的道统，而归有光指向的“道”更多是回归到文章内容本身。此外，他的“养气”说，也是受到韩愈“文气说”的影响。二者都是指向作者内在的道德修养。为此他常以“气”来评点韩愈的文章。

唐顺之作为唐宋派的中坚分子，寄望通过编选古文选本来阐述他为文必有法的文论观，《文编》便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面世。书中所引用的评点符号也与评点发展初期的宋代选本更为精细，也比归有光的《文章指南》所使用的评点符号更为多样、仔细。即便如此，也可发现唐顺之的《文编》

评点依然延续了宋代的形式。他作为明代唐宋派中影响较大的人物,《文编》的编选不仅仅是为了指导举业,也更是为了阐发他的文法观。《文编》大量选录了韩愈的墓志铭、书、序、杂著和行状类文章,这样的选录标准正式延续了宋代以来文论家对韩愈文章的评选方式,不管是归有光,还是唐顺之,皆延续了此种选法。

至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选则是受到唐顺之的影响,并在此书刊行以后“八家”选本也在坊间广为接受,导致此书在后来的流传度与接受度比起归有光的《文章指南》和唐顺之的《文编》更为广泛。茅坤编选此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要让时下学子掌握为文的技巧,同时间也为了要确立唐宋古文在当时正统的地位,以便时人能清楚认识到唐宋散文的价值所在。因此不能只是单纯地把《唐宋八大家文钞》看成仅仅是为了服务举业之作。此书所使用的评点符号大体上还是与《文编》相似,由此可见,《文编》和《唐宋八大家文钞》所使用的评点符号正是当时明代普遍盛行的评点符号。

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三人在明代当时鼓吹复古的文学思潮之下,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师法唐宋”的文学主张,虽然各自的主张稍有不同,但是大体的方向仍是一致,那即是反对剽窃,对前人的文章依样画葫芦,而是强调为文需要直抒胸臆,表现作家自我的想法,并且希望以选本来阐发文论以期要建立从唐宋到秦汉的一条学文途径。唐顺之曾把唐之韩愈比作汉之司马迁,宋之欧即唐之韩愈,此乃就古今作家的相同点来立论。而茅坤则注重作家的相异之处和个性特点,以为“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

自不同”，认为不应把它们等同起来，茅坤论文非常注重作家的个性和独创性。

归有光在评论和总结韩愈文章特色多侧重于点评韩愈文章的结构章法，并提出了韩愈文章具有新奇的特征。韩愈文章“新奇”之处具体体现在文章句法的多样化和多变动，不拘于一种体则而已。他也进一步指出韩愈文章的特点在于擅长使用双关文法。除此之外，他也点出韩愈文章与孟子文法之渊源，而这种对韩文的评价同样也非归有光的创见，也是延续了宋代以来文论家对韩愈学孟子笔法的观点。只是归有光在这一基础之上，使用韩愈文章作为实际例子标出韩愈文章与孟子文法二者的相似之处。

然而《文章指南》此书自刊行以来，流通与接受度远没有其他选本来得广泛，而归有光的影响力在当时也远不及唐宋派其他诸子来得高，一直到明末后七子王世贞的大力推崇，才使得归有光在明、清之际享有极高的声誉。

唐顺之在评论韩愈文章多从结构和文法着手，也点出了韩愈不同文体之特色，如韩愈“序”文的特色为“奇”，源于其立意巧妙了；而“书”的特点则是多变化的表达、“直”和前后呼应；“墓志铭”文重在叙述手法的使用。有关于对韩愈此类文体的评价，茅坤亦持有与唐顺之相似的观点，由是可看出二者之间的文学继承的联系。唯独茅坤却点出了韩愈墓志铭、碑文类的文章特点为“巉削”、“盛气掬挾，幅尺峻而韵折少”以及“奇崛险譎”，不得司马迁的笔法。而他对韩文的侧重点与唐顺之稍有不同，更

为看重韩愈的碑志、序文和记类的散文。此外，他更认为韩愈的书、记、序、辩、解及其他杂著乃是韩愈所独倡，并将之譬喻为禅宗的达摩。

与归有光不用，唐顺之注意到韩愈“墓志铭”体的文章乃是学习与借鉴司马迁笔法。然后也指出了韩愈虽在学习古人，却也会力求新变，自成一格。唐顺之也指出韩愈此类文体对后来宋代欧阳修和王安石等人笔法之影响。这也正引证了唐顺之所谓的唐宋之文乃是有法之文的说法。而唐顺之对韩愈文章的评点也正是源自于他文学理论——“本色”论和“文法”说。

唐顺之的“本色”论是指向文章的“真精神”，须是直抒胸臆，并且兼容诸家特点。而唐顺之的“文法”说则是指向文章命题、篇章布局、练字遣句和叙事手法。唐顺之这两大主要的文学理论也是自韩愈而来。茅坤也以“本色”二字直接点出韩文具有“昌黎本色”。然而茅坤的“本色”却又与唐顺之的“本色”稍有不同。唐顺之的“本色”是从文章内容出发，而茅坤的“本色”则是从作品的风格和文句下手。

茅坤认为韩愈的“本色”大体呈现在其善于譬喻，文章平直通显，去陈言以致有精爽，但是字句却生割。他更多看重韩愈文章中的字法和句法，并指出韩愈多使用生僻拗口的字句。虽然茅坤的文学观点大体源自唐顺之，对于“道”的观点，茅坤则是指向儒家的正统思想。他认为为文既要继承古人的同时亦要独创，主张学古而不拟古。茅坤所提出的为文法度不仅仅只是关注文章的谋篇布局和文章结构，更多的在于他继承了唐宋文“有法可循”的思想，将为文之法和文统结合在一起，隐含于作家的性情之中。这

也是茅坤对韩愈文学思想的继承。他也提出可“万物之情，各有其至”和“神理”之说的观点。这二者的观点皆是源自于唐顺之而来。

归有光、唐顺之和茅坤三人都擅长为时文，而所谓的“时文”在明代是指向用作科举考试的文体，或称经义、制义、制艺、制举业、举子业、四书文，俗称为八股文。²三人的文章风格也各有特色，不仅致力于写作，也通过编选文集加强其文学观的传播与影响。

从《文章指南》再到《文编》以及最后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不难发现归有光、唐顺之和茅坤虽为文风格各不相同，但不同的风格之中又有共同之处。他们皆认为“法”是写文章的自然法则，诸人皆主张学习前人的行文精神脉理，反对拘守模拟古人词句。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基本上即是归有光、唐顺之及茅坤这一“唐宋派”论文的观点，亦是他们选文的主要准则。他们“师法唐宋”的主张也并非单纯地褒扬或针砭任何一个作者，而是针对各家各体的特色，提出师法各自擅长的文体，更指出各家各文体的优点与不足。

由于本文仅就唐宋诸子的古文选本中对唐代韩愈文章的选录作为研究对象，日后仍然可以把研究方向延伸至对唐、宋其余七家之文的选录情况作探讨。

² 邝健行，〈明代唐宋派古文四大家“以古文为时文”说〉（《中国文化研究学报》1991年第22卷），页219。

引用文献

古籍

[唐] 杜牧，吴在庆 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清] 方苞 著，刘季高 校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陕西：三秦出版社，1998。

[明] 归有光，《文章指南》，台北：广文书局，2013。

[明] 归有光，《补刊震川先生集》，《续修四库全书》第 135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明] 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宋] 黄震：《黄氏日抄》卷 59，[清] 永瑢，[清] 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70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明] 黄子肃：《诗法》，[清] 顾龙振编辑：《诗学指南》卷一，台湾：广文书局，1970。

[明] 黄宗羲，吴光 主编，《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宋] 洪迈，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

[宋] 李涂，刘明晖校点，《文章精义》，香港：中华书局，1977。

[南朝梁] 刘勰着，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后晋]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三国] 陆机，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南宋] 吕祖谦评，[清] 徐树屏考异，《古文关键》，台湾：广文书局，1970。

[明] 茅坤，《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愈文钞》，合肥：黄山书社，2009。

[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文》第256册卷五七五九，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5册，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明] 唐顺之，《文编》，明嘉靖福州知府胡帛校刊本，1522-1566。

[明] 唐顺之，《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明嘉靖癸丑32年本，1533。

[清]王夫之、戴鸿森点校，《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姜斋诗话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

[明]王世贞，陈书录选注，《王世贞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明]吴纳，[明]徐师曾，《文章辩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台北：泰顺书局，1973。

[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台北：广文书局，1970。

[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研究论著

贝京，《归有光研究》，北京：商务出版社，2008。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1999。

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

- 黄毅，《明代唐宋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李璠，《中国文学概论》上册，台湾：国立空中大学，1989。
- 李修生，《中国文学史纲·明清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廖可斌，《压抑与躁动：明代文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20。
-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吕新昌，《归震川及其散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
- 全华凌，《清代以前韩愈散文接受研究》，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
- 沈新林，《归有光评传·年谱》，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万曼，《唐集叙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 谢无量，《实用文章义法》，台北：华正书局，1974。
- 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 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

章培恒，《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钟志伟，《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台湾：文津，2008。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期刊论文

贝京，《唐顺之本色论重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三期，页81-85。

蔡定昌，〈论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继承与删改〉（《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7月第五十二期），页227-272。

付琼，〈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明清时期的衍生和流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4期，页87-91。

付琼，〈唐宋八大家选本与明清文学教育的适配〉，《天府新论》2008年，页139-143。

付杉杉、付琼，〈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茅著本考录〉，《潮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一期，页28-34。

姜云鹏，〈明代韩愈古文选本概述〉，《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三期，页122-125。

姜云鹏，〈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文艺评论》2013年第六期，页132-134。

邝健行，〈明代唐宋派古文四大家“以古文为时文”说〉，《中国文化研究学报》1991年第22卷，页219-231。

林春虹，〈《唐宋八大家文钞》与茅坤的文统观〉，《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二期，页114-118。

林春虹，〈茅坤评点的传播与刊刻形态的变迁〉，《古典诗学》2016年12月，页50-57。

刘尊举，〈唐宋派“师法唐宋”辨析〉，《古代诗学的现代阐述》2011年8月，页53-59。

吕湘瑜，〈宋明清古文选本述略——典范形成的历程〉，《辅大中研所学刊》2007年第十七期，页235-255。

全华凌，〈明代士人接受韩文述论〉，《理论与创作》2010年3月，页119-123。

全华凌，〈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一期，页53-76。

全华凌，〈论宋人选编韩文学学术标准的嬗变〉，《求索》2011年12月，

页 197-199。

宋克夫，余莹，〈唐宋派考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三期，页329-333。

孙彦，〈从《文编》看唐顺之的“文法”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12月第四期，页123-127。

王兵，〈古代文学选本批评效能的影响因素〉，《滁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四期，页21-23。

夏咸淳，〈《唐宋八大家文钞》与明代唐宋派〉，《天府新论》2002年第三期。

解国旺，〈论明代古诗选本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电影评介》2007年第二期，页87-89。

雍繁星，〈阳明心学与唐宋派〉，《首都师范法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页93-96。

张智华，〈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文论〉，《文学评论》1999年第六期，页43-52。

硕博论文

陈禹齐，《归有光论文章体则与其作品研究》，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0。

何梓庆，《明代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香港：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姜云鹏，《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梅篮子，《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渊源与流传考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沈思，《唐宋派对韩愈文论的继承与发展》，中国湖北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14。

孙琰，《韩愈诗歌的选本接受研究》，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杨峰，《归有光研究》，中国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